**枫桥经验紧扣时代脉搏历久弥新**

**编者按**  
　　五十五载光阴荏苒,有许多事物在岁月洪流中销声匿迹。  
　　而一项来自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经半个多世纪,却迸发出穿越时空的旺盛生命力。  
　　这正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即: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  
　　1963年,毛泽东同志对这一经验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自此,“枫桥经验”这个记挂着人民、承载着平安的名词,从美丽的枫桥镇走出,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一面旗帜。  
　　进入新世纪,经历岁月洗礼的“枫桥经验”,不仅没有被遗忘在人们记忆里,反而历久弥新、历久弥坚。  
　　2003年,习近平同志作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时代背景下,“枫桥经验”再次显示其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  
　　五十五载栉风沐雨,“枫桥经验”始终未变。未变的是善于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在灵魂。  
　　五十五载砥砺前行,“枫桥经验”始终在变。变的是因时而动、不断创新,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时代新需求。  
　　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已不仅仅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功经验,还是依靠人民群众促进社会治理的创新象征,更是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精神力量。  
　　2018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是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在这个特殊年份的春季,《法制日报》赴浙江采访组深入十余个地市,探寻“枫桥经验”魅力所在、记录“枫桥经验”五十五载变与不变背后的故事、见证“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焕发出的蓬勃生机。  
　　本报自今日起,开设“新时代‘枫桥经验’新亮点”专栏,连续刊发本报记者在深入调研采访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敬请关注。 **【引子】**  
　　 到诸暨市枫桥镇采访首日,记者就开始寻访一个人。这个人叫陈柏云,找他的目的,是想听听关于他父亲陈友堂的故事。陈友堂,曾任枫桥镇枫溪村党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已去世多年。  
　　55年前,正是他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创造了“枫桥经验”,寻找陈友堂的故事,也是对“枫桥经验”探源。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寻访陈柏云的行程,被一段小插曲打断了。  
　　按照规划好的路线,3月28日上午,《法制日报》记者一行将从枫桥镇的红枫义警工作站出发,前往陈家村采访陈柏云。可是,一到“工作站”,记者寻访的脚步就被绊住了。  
 **创新 引导支持社会组织参与调解**  
　　在枫桥镇的红枫义警工作站,红枫义警协会秘书长陈荣周忙前忙后,招呼着记者一行。  
　　聊起采访“枫桥经验”化解民间纠纷的事,陈荣周笑呵呵地说:“农村就是琐事多、家庭纠纷多。”  
　　扯起这个话题,陈荣周随口就是一个故事:  
　　我们枫桥镇有位村民叫陈中华,经营木门业务。今年1月的一天,他将做好的一扇木门送到客户陈某家。  
　　见到定做的木门,陈某有些不乐意:这门的一角被碰坏了,缺角影响木门的美观。  
　　陈某不肯收货,陈中华也不干了:不就缺个角吗?又不影响使用。  
　　一言不合,两人拳脚相向。厮打中,陈中华的小手指被对方咬伤。  
　　这下可好,陈中华要求住院治疗并由陈某赔偿医疗费。陈某却说,是你先出的错,凭什么要我赔偿你?  
　　双方僵持不下。  
　　枫桥镇网格员获知消息后,第一时间通过终端将信息上报综治工作平台,综治工作平台又交由镇公安派出所解决。  
　　考虑到红枫义警协会成员的群众身份,派出所将这起纠纷交给协会调解。  
　　“我当时是主动请缨,去做调解工作。”陈荣周一脸自豪。  
　　陈荣周分析两人的纠纷原因之后,先是找到陈中华,说:“就是手指头被咬了,用不着住院。事情不要搞大,冤家宜解不宜结。”  
　　再找陈某,告诉他:“咬了人,肯定要赔点钱,过得去就好,礼节上也要赔礼。要不然,事情闹到派出所就严重了。”  
　　几句“点穴”的话让双方达成协议,陈中华得到800元赔偿。  
　　陈荣周很认真地告诉记者,红枫义警协会是一家刚“出世”的社会组织,成立于2017年7月,经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红枫义警协会的成员都是当地群众,大家热衷社会公益,具备一定群众工作经验,有一定社会威望。  
　　“我们从群众中来,调解时又是到群众中去,双方容易沟通。”陈荣周说。  
　　陪同记者采访的枫桥镇综治办主任傅鑫炜插话说:“枫桥镇这几年发展社会组织220家,光是镇级社会组织就有47家,目的是引导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同时,镇里还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促进基层治理创新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发展的实施意见》,作为制度化保障。我理解,这就是‘枫桥经验’再创新。”  
　　纸杯里的青茶乏味了,寻访陈柏云的事依然没有进展。负责联系的人说,陈柏云外出了,可能要到中午才能回来。  
　　“不如先找个人和你聊聊‘老杨调解中心’吧,那可是‘枫桥经验’的一张‘金名片’,有故事。”傅鑫炜说。  
 **传承 和风细雨化心结矛盾不上交**  
　　老杨,大名杨光照,曾是枫桥镇公安派出所民警。从警期间,杨光照一直尽心帮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杨。  
　　2008年,也就是在习近平同志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后的第5年,老杨和枫桥镇3名退休干部一起成立了“老杨调解工作室”。  
　　两年后,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下,“老杨调解工作室”更名“老杨调解中心”,专为群众调解纠纷。  
　　“老杨调解中心”在当地可谓妇孺皆知。  
　　特别是枫桥镇梅苑村的张金标更有发言权,要他说,如果需要调解,首先想到的是老杨,“因为他公正”。  
　　走进枫溪边张金标家,院子周围的油菜花开得正盛。  
　　坐在自家饭厅的椅子上,张金标回忆起他第一次走进“老杨调解中心”的来龙去脉:  
　　那是去年12月29日下午,他接到一个电话,说他的儿子张杰被人打了。  
　　原来,当天枫桥镇枫一村的陈伟和几个半大小子找到张杰,质问张杰是否骂过他们。张杰一口否认。  
　　陈伟却不相信,冲上去抓住张杰头发,一边将他的头往下压,一边抬起膝盖撞他的脸。  
　　张杰因鼻骨骨折住院治疗。陈伟的母亲尉女士虽然登门道歉,但在赔钱的事上,却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双方决定“找老杨”。  
　　今年2月1日,张金标父子赶到“老杨调解中心”时,尉女士带着陈伟正在等他们。  
　　在调解中心,老杨安排双方坐在桌子两边,他则居中而坐,面带和蔼笑容,开场白是几句家长里短,这让现场气氛轻松了许多。  
　　调解正式开始,老杨先对尉女士说,你儿子陈伟把人家鼻骨撞骨折,根据伤情可能构成轻伤,你儿子可能要负刑事责任,你们还要承担医药费等损失。  
　　老杨又对张金标说,不管怎么说,陈伟是未成年人,应受到法律保护,可依法从轻处理。再说了,陈伟家长态度诚恳,能认错改错,应该给予谅解。另外,他们家经济不宽裕,能不能少赔偿一点损失?  
　　话说到这份儿上,张金标点头说,只要孩子改错,以后不再犯错就行。钱不是问题,我不会“敲竹杠”。  
　　最终,在老杨的主持下,由尉女士补偿张杰3500元并当场兑现。  
　　调解完毕,双方合影留念。  
　　照片上,张金标和尉女士两人紧紧握手,脸上满是笑容。在他们身后的墙上,是一块“和气致祥”书法牌匾。  
　　从张金标家去“老杨调解中心”路上,付鑫炜告诉记者,这起纠纷调解后,老杨发扬“枫桥经验”帮教工作传统,又和枫桥镇关工委相关成员、陈伟家长组成帮教小组,签订帮教责任书,帮助陈伟归正改好。这样的事老杨做了多少?谁也说不清。  
　　在“老杨调解中心”,记者见到了年近七旬的杨光照,他身穿一套藏青色职业套装,胸前戴着“人民调解”徽章。  
　　“这些纠纷能够调解成功,秘诀在于我们传承了‘枫桥经验’的精神,依靠群众力量解决群众之间矛盾。”杨光照告诉记者。  
　　时近中午,传来消息:陈柏云外出归来。记者一行立即动身前往陈家村。  
 **溯源 干部群众集体创造“枫桥经验”**  
　　年届七旬的陈柏云身材颀长,穿一件黑色衬衣,头发有些花白,精气神十足。他将记者一行迎进家门。  
　　这是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小院子,走进院门便是天井,天井左手为厅堂。陈柏云带记者来到厅堂,在桌边坐下,回忆起他的父亲陈友堂和“枫桥经验”初创时的情形:  
　　1963年,浙江省在枫桥镇搞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大家在讨论如何教育“四类分子”等被改造对象时,枫桥镇枫溪村党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陈友堂提议:还是要讲情讲理,只有这样,对方才会心服口服。  
　　陈友堂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教育,没有打人、捕人,却成功教育了不少被改造对象。  
　　有一次,枫溪村第三生产队开会教育被改造对象,会上,陈友堂允许被改造对象坐下,允许他站起来讲话,允许他争辩。会后,这个人回家,老婆问他情况,他说:“没打没骂,人家摆事实、讲道理,我最后觉得是自己不对。”第二天一早,这个人就主动写了书面“悔过书”。  
　　还有一个被改造对象,上级公安机关准备把他送去劳动改造。陈友堂知道后,跑到县里去“保”他,建议“就地改造”。对陈友堂的举动,很多人不以为然。陈友堂说,一个人去劳改,留下老婆孩子,给国家增加了一分负担,如果就地改造,有上千群众可依靠,还怕管不住?  
　　枫溪村的这一做法,经过不断完善和提升,最终形成了“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  
　　采访中,陈柏云操着浓重的诸暨方言告诉记者,父亲一直对他说:“‘枫桥经验’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是干部群众集体创造出来的。”  
　　结束对枫桥镇的采访,返程路上经过枫桥镇栎桥社区服务中心,记者发现,服务中心办公楼顶上立着5个红色大字“永远跟党走”,在蓝天映衬下格外醒目。  
(文中张杰、陈伟为化名)(本报记者　张亚　崔立伟　陈东升　贾宝元 陈磊　王春)  
　　**记者手记**  
　　镇,中国行政区划基层单位。  
　　55年前,发端于如此基层单位的“枫桥经验”,为什么能够引起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并批示全国推广?  
　　诸暨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会长陈善平解惑:原因在于“枫桥经验”的灵魂,就是引导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纠纷,矛盾不上交。  
　　对这个解释,记者深以为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以“四类分子”等被改造对象为主体带来的民间矛盾和问题相当突出,如何在群众中解决矛盾、化解问题是个带有普遍性的基层难题。“枫桥经验”应运而生,为一向善于发现人民群众首创经验的毛泽东同志所重视并积极倡导推广全国,应该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此后,“枫桥经验”因时而变,几度创新,日益显示出其在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化解民间矛盾纠纷,进而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当中具有越来越强大的能量和生命力。  
　　行走于枫桥镇,记者最强烈的感受是祥和。无论是镇上人还是村里人,同样春风和气、善气迎人。初见此景心中称奇,深入攀谈方知由来,“要戴致富帽,先戴平安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有村睦人和,才能干事,干成事”。这是枫桥镇干部群众常挂在嘴边的金句。  
　　正是在这种朴素的认知下,“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不但没有变,还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诸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张怀斌对记者说,2003年10月,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近年来,诸暨市始终坚持“枫桥经验”基本精神不动摇,并且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丰富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新内涵。  
　　按照张怀斌理解,新内涵就是:以群众为主体,推动治理主体从多方凝聚；以善治为目标,推动治理方式向多元集成；以基层为基点,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科技为支点,撬动治理手段向信息化、数据化转变等等。  
　　在诸多创新举措中,令记者印象最深的是:枫桥镇一直探索全方位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以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这正契合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而要形成这种格局,既离不开党委领导,也离不开群众参与。  
　　这也和“枫桥经验”的要义高度一致,那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扎根于群众之中。  
　　在枫桥镇的采访,让记者感知到“枫桥经验”旺盛的生命力,就像枫桥的春天,枫林披绿、油菜花黄、生机盎然。

**枫桥经验在互联网之都焕发新生机**

**【引子】**  
　　在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采访时,记者被一个预言吸引。“中国在法律技术领域将成为下一个领导者?”  
　　预言者,是英国首席大法官科技顾问理查德·萨斯金,曾预言“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他将在西湖法院看到的一切,写进预言里。  
　　发源于诸暨农村的“枫桥经验”,在杭州这座互联网之都,正在上演着精彩的都市升级版。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3月28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院长程建飞,在法院洁净的会议室里,绘声绘色地向《法制日报》记者忆起:2017年7月29日,萨斯金到访时的场景,顶着40多摄氏度高温,穿着笔挺的西装,认真观看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的操作流程,反复确认法院有没有水分,当他发现“枫桥经验”在这个现代化大都市得到的创新发展真实可信时,情不自禁为这一“东方经验”点赞。  
 **走入基层法院 线上调解一次不跑**  
　　西湖区文二西路9号,一座白色的建筑。  
　　这里便是西湖区法院审判办公大楼。大楼里有个被作家麦家写进书里的名人,她就是陈辽敏。  
　　她有着一张娃娃脸,笑起来十分和善,让人印象深刻。  
　　陈辽敏,西湖法院副院长,全国模范法官,手里有绝活儿:经手的案件结案率达95.4%,调解撤诉率达84.4%,无一例引发缠诉上访。  
　　程建飞用赞赏的语气说:“陈辽敏可厉害了,她用极大的热情拥抱互联网技术,从开通陈辽敏网上调解工作室,到电子商务法庭,电子督促程序、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创新之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在法院的会议室里,陈辽敏一边给记者作PPT演示,一边津津乐道起了平台的评估功能,在一起图片侵权案件中,原告通过在线评估,获得了一份包括裁判规则及具体分析、中立评估结果的评估报告,对纠纷解决有了更合理的心理预期,最后这个案件被快速调解。  
  
　　若非亲眼所见,记者确实不敢相信老百姓在打官司之前,能够享受如此便捷的司法服务。  
　　仔细打探才知道,在线矛盾多元化解平台,是中央综治办赋予浙江的创新项目,也是西湖法院触网实践的闪耀成果,为老百姓提供线上与线下结合、诉讼与调解对接的司法服务,赋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新内涵。  
　　从法院会议室出来,记者前往法院诉调中心,打算找一位名叫胡颖的法官再聊聊。  
　　不料,在法院诉调中心,迎面碰到从南京来的律师——常乐。一番介绍之后,常乐告诉记者,她是趁着出差来杭州的机会,专程找胡颖道谢的。  
　　见记者疑惑,常乐莞尔一笑,道出原委:“今年3月初,我申请网上立案不久,胡法官就联系我,问我愿不愿意在线调解。当时就想,杭州的法官真热情,自己还没主动联系,法院就主动服务了,如果不用跑法院就能了事,当然求之不得……”  
　　齐耳短发,柔声细语,斯文秀气的胡颖接过话茬:“征得常乐与在杭州的被告同意后,我就将他们约到各自的电脑前,大家谈得很顺畅,不到半个小时,这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就调解成功。”  
　　“当然,在线调解并非没有难度。”胡颖赶忙补充说,其中,家事纠纷在线调解挑战最大。  
　　胡颖向记者回忆起一对老年夫妻闹离婚的事。  
　　这对老夫妻,一方在上海,一方在杭州,前后在线调解了三次,从女哭男骂,到子女调停,再到最后调解离婚,胡颖耐心倾听、苦心劝和、诚心解怨,虽然费了几番周折,但唯一欣慰的是这对老人省去了来回奔波之苦。  
　　眼见为实。  
　　记者登录这个平台看到,除了在线评估、调解,还集在线咨询、在线仲裁、在线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服务于一体。2017年3月正式上线,从西湖区扩展到全省10个先行试点地区,访问量达87万余人次,注册调解员1.35万余人,调解申请3587件,目前平台功能仍在不断更新迭代,正在为全球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积累“中国经验”。  
 **走进调解中心 海量纠纷多元化解**  
　　每间办公室,都像紧张的生产车间,从四五个人到十多个人不等,每张办公桌前,各种投诉举报、案件移送材料、协查函、文件袋堆积如山,打印机声、电脑键盘声、电话声、交谈声此起彼伏。  
　　这是记者一行走进余杭区网络交易纠纷调解中心看到的情景。  
　　杭州市作为互联网之都,网络纠纷当然不会少。  
　　余杭区——阿里巴巴集团大本营所在地,也是全国网络消费投诉举报、矛盾纠纷调处的集散地。  
　　一组数据,让记者一行为之一惊。去年,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就受理了网络消费投诉举报20.4万件,占据了全国总量的半壁江山。  
　　一个区级执法力量,如何消化海量纠纷?  
　　记者在各个工位间“游逛”了个把小时,终于找到了答案:从2015年开始,余杭区在网络交易纠纷领域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在全国首创网络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成立调委会,依托市场监管局网监分局设立调解中心,开启了多元化解之路。  
　　记者采访的时间是3月28日,赶上了余杭网络交易纠纷在线调解平台一期功能正式启用,网监分局工作人员俞勍在电脑前忙碌开来,但比起以往她轻松了许多,过去要根据表格订单信息,挨个调取商家信息,如今点点鼠标,订单号、投诉人信息、交易快照均可直接点开,连投诉人在平台的维权记录都一清二楚。  
　　俞勍告诉记者:“有些投诉人其实已在平台上处理过,以前,我们跟瞎子摸象一样,他们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但现在,平台自动接入了淘宝网天猫平台数据,就能很清晰地查阅交易信息、维权记录,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调解工作。”  
　　除了借力互联网技术,一支由20名专职人民调解员的调解队伍驻点办公,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三者结合,平台自动生成调解协议文本,还可以实现一键式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对于多元调解力量的注入,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徐全伟特别有感触:“真心感谢人民调解来分忧,这正是在新时代运用‘枫桥经验’化解新矛盾的生动写照。”  
　　徐全伟说,余杭每年仅受理网络行政复议案件就多达700多件,申请信息公开案件1300多件,牵扯大量精力,引入人民调解后,2017年累计调解纠纷1.9万件,行政复议案件下降至200余件,效能投诉也下降了40%。  
　　让徐全伟欣慰的,还表现在今年“3·15”晚会上,两个小时内,余杭陆续收到400多件举报投诉,晚会结束前就成功调解了140多件。  
 **走访四个平台 精细治理贴心服务**  
　　宽敞明亮的大厅里,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这四个平台依序排列,设立了一排业务受理窗口。  
　　在余杭区临平街道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江西人廖芳芳拿着受理通知书,收拾好各种材料,满意地离开居住证积分受理窗口。  
　　这是杭州今年实施的积分落户新政,从3月1日开始申请,截止到当月底,廖芳芳是临平街道第267名申请者,她在余杭买了房子,为孩子上学的事,想要早点儿申请落户。  
　　这个月,窗口工作人员吴珏,总能遇到像廖芳芳这样为子女读书而担心的家长,在回答各类咨询时,她发现,这些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不正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的人民群众新需求吗?  
　　这是临时增设的服务窗口,而吴珏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负责“派单”,她每天要盯准基层综合治理信息平台,一旦有网格员上报信息,就要第一时间流转给“四个平台”的相关职能部门。  
　　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部署,余杭打造了以“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四个平台+全科网格”为组织架构的基层治理体系,贯彻落实“枫桥经验”,即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的目标。  
　　平头、格子衫,邱惠良一开口,就展露出风风火火的性格,他从城管执法局调至临平街道党工委任副书记已近3年,亲眼见证了11个部门基层站所的上百名执法人员下沉到街道,84名专职网格员、92名网格指导员、2860名兼职网格员扎根在城乡社区,自觉参与信息报送、提供贴心管理服务,致力于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大联动指挥中心、基层治理信息系统、网格电子地图、手机APP,各种智能化应用,配上全科网格,让社会治理像绣花一样精细。  
　　“过去长期困扰基层的看得见但管不着的问题,几乎没了。”邱惠良坦言,通过“四个平台”,街道还一一攻克了“僵尸车”、油烟扰民、老旧小区车库出租经营、“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等难点问题60多个。  
　　余杭区委副书记王进说,今后,余杭将在大数据应用和智能化分析,在融合发展提升街道统筹能力,更加方便群众办事等方面下功夫,为困难群众提供代办帮办服务,努力以“四个平台”建设来助力“最多跑一次”,进一步打造服务型政府。(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贾宝元　王春　陈磊)

**桐乡“三治”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

**【引子】**  
　　桐乡,不是乡,是个县级市。桐乡市隶属浙江省嘉兴市。  
　　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就坐落在桐乡市乌镇。  
　　近几年,桐乡市在努力做好一件事:传承“枫桥经验”精髓,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三治”建设。“三治”旨在促进群众参与、表达诉求,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产生。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这样28个字描述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新方向:“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桐乡,就是这28个字的践行者。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春日的虹桥村,和风暖阳,碧空中飘着丝丝薄云,虹桥村的主干道慈云路两边是联排仿古民居。  
　　虹桥村是桐乡市乌镇下面的一个村子。“乌镇管家”是桐乡实践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一个缩影,虹桥村则是“乌镇管家”的发源地。  
　　3月30日中午时分,《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从这里开始。  
 **村民自管预防矛盾产生**  
　　在虹桥村村委会一间办公室里,66岁的村民田文荣取出一件红色的马甲套在身上,与他一样穿着红马甲的,还有63岁的村民吴宝林和56岁的邱明华。  
　　马甲正中央是一个图标:黄色圆环,两条蓝色、两条绿色带子联通其间。图标的正下方是4个字:乌镇管家。  
　　图标上面还有几个小字:乌镇管家联动中心。  
　　陪同记者采访的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沈云波介绍说,“乌镇管家”其实是一支基层网格信息员队伍。  
　　记者随田文荣等人从村委会走出来,开始例行巡查。一行人径直穿过街面,沿着慈云路一直向前走。  
　　走出一二十米远,田文荣在北虹桥上停了下来,右手指着桥下的河水对记者说,河面上漂浮的落叶落花太多,影响环境,如果不及时清理,村民会对村里、镇里有意见。  
　　又走出十几米远,吴宝林弯下腰在捡什么东西。  
　　记者上前一看,是树坑里的鹅卵石滚了出来,吴宝林把石头捡回树坑。  
　　“石头要是被谁踢到路面上,不安全,容易引发纠纷。”吴宝林说。  
　　继续往前走,前面两个垃圾桶的盖被翻开,吴宝林上前把桶盖扣上,“天热了,垃圾容易生蚊虫,影响环境,大家会有意见”。  
　　……  
　　记者注意到,他们在街面上发现的问题、隐患,能解决的就自行解决,不能解决的就记在一个笔记本上,向村里反映,如果问题比较紧急或比较难办,则直接通过手机终端上传至乌镇管家联动中心协调解决。  
　　巡查间隙,穿着红马甲的吴宝林开心地向记者展示手中的笔记本。笔记本像小学生的识字本大小,封面正中央是竖排的“笔记本”3个字,左上角印着艺术字“乌镇”,右上角印有竖排“虹桥管家”字样。  
　　另一位陪同记者采访的乌镇综治办工作人员高博是一位女生,说话风风火火。  
　　她的体会是,“乌镇管家”继承和发扬了“枫桥经验”的精髓,推行以来,当地的矛盾纠纷少多了,现在的“乌镇管家”更多是及早发现隐患,预防和避免矛盾发生。  
 **“好坏大家判”化解纠纷**  
　　站在慈云路上,田文荣讲起他的亲历。  
　　2015年年初,为了协助维护乌镇社会秩序,紧挨着乌镇景区的虹桥村要组建一支群防群治队伍,他作为村里的先进分子,报名参加。  
　　田文荣述说着队伍组建时的情景:“那是2015年1月4日,是一个晴天,上午8点钟,我们先在村委会集合,每个人领到一件马甲、一个袖章,上级对我们动员后,我们就上街了。”  
　　那天,田文荣他们出发不到500米,就看到慈云路上一座牌坊的一根木头快掉下来了,他们赶紧拍照,将情况汇报至村里的信息平台,再由村里的网格信息员上报乌镇有关部门。当天下午,乌镇相关部门派人将牌坊维修完毕。一个可能引发纠纷的安全隐患就这样被他们消除了。  
　　田文荣自豪地说,到了2015年10月,乌镇才正式组建“乌镇管家”,而到今天,他已经当了近3年的“乌镇管家”。  
　　高博边走边介绍说,“乌镇管家”组建后,曾处理了不少矛盾纠纷。  
　　她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2016年5月,“乌镇管家”、村干部吴晓峰在严家浜村民组巡查河道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吵架的声音。他走近一看,有四五个人在争吵,眼看就要打起来。  
　　吴晓峰见状赶紧上前制止并了解情况。原来,严家浜村民组村民周关林家有一小块土地在另一位村民周某家门前,周关林在这块地上堆放着稻草和柴火等杂物。周某的儿子要结婚,觉得这堆杂物影响美观,要求周关林把杂物清除。周关林不予理会。周某急了,就出现上面的一幕。  
　　吴晓峰提议,“乌镇管家”工作站里不是有道德评判团吗?你们这样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不让道德评判团来评评理?  
　　双方都同意了,一起前往“乌镇管家”工作站。随后,道德评判团成员,也是村里颇有威望的人士周杏林、严鹤鸣、严永坤接到通知后赶了过来。  
　　了解事情原委后,严鹤鸣说:“邻里乡亲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两户人家因为小事吵到要动拳头,你们看划得来吗?我的想法是大家都退一步,邻里关系和睦还是最要紧的。”  
　　严永坤建议说:“周某家不是有块地么,你们两户人家换一下好了,平时大家也只是堆放点杂物,也没有多大用处。”　  
　　经劝导,双方接受道德评判团的建议,决定互换土地,再由村委会出具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  
　　沈云波在一旁补充说,由“乌镇管家”组织的道德评判团在村里有威望,调解结果也能为村民所接受,把村里的矛盾化解在村里,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这也是对“枫桥经验”精神的发扬光大。其实,道德评判团是桐乡市高桥镇越丰村首创的。  
 **“枫桥经验”开出“三治”花**  
　　听说道德评判团是高桥镇越丰村首创的,记者提出要到越丰村看看。  
　　沈云波遗憾地说,越丰村正在建设“三治”示范园,那里是一片大工地,交通不便,无法前往。  
　　虽然无法前往,也要把情况了解清楚。  
　　高桥镇党委副书记徐晓叶一直在“三治”示范园建设的工地上忙碌着,记者通过电话对她进行了采访。  
　　伴着工地嘈杂的“背景音乐”,徐晓叶告诉记者,在2013年,高桥镇率先建立了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这三个基层治理平台,推行“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试点。  
　　“我们对‘三治’的定位是,治未病,在矛盾爆发前,就进行沟通和疏导,不让矛盾爆发或蔓延。”徐晓叶解释说。  
　　徐晓叶进一步解释,百姓参政团就是让百姓在重大问题上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形成“大事一起干”的良性机制；村级层面道德评判团,就是要强化道德约束力,形成“好坏大家判”的民间氛围；此外,整合村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各支队伍,组建全方位的百事服务团,形成“事事有人管”的互助局面。  
　　徐晓叶说了个百事服务团提供法律帮助的故事。  
　　越丰村的张老太有3个儿子,但他们都不管母亲。2016年8月,为解决这起赡养纠纷,村干部为张老太请来免费的律师提供咨询,还喊来3个儿子进行调解。  
　　法律、道德、规矩一起上,终于让3个儿子与张老太达成一致:轮流赡养,每月给母亲钱。  
　　当时,村干部想,如果这个问题还不能解决,就出“大招”:请道德评判团上门做工作,对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评议和曝光。  
　　徐晓叶对记者说,2016年2月,高桥镇在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三大治理载体基础上,把原设于镇级层面上的百姓参政团延伸到村和社区,设立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推进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再创新。  
　　徐晓叶的真切体会是,这几年,高桥的大发展并没有像一些地方那样带来各种矛盾的大爆发。  
　　记者问徐晓叶,建设“三治”示范园会不会对村民生活产生影响?  
　　电话那头的徐晓叶说,在越丰村,由于供电线路改造、现场尘土飞扬,她特意问街道主管人员,有没有村民反映工程影响环境的,结果工作人员告诉她,施工期间没有接到一起投诉、也没有发生一起信访。“因为在工程开工之前,越丰村通过‘两团两会’载体就此问题有过充分沟通,得到了村民的理解和全力支持。村民们纷纷表示,这是为大伙办好事,有点麻烦能克服”。  
　　见记者挂断了徐晓叶的电话,沈云波补充说,正是“三团”平台让老百姓自己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越丰村矛盾纠纷“零上交”,真正实现了“大事、小事都不出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自治的方式；依法解决问题,是法治的表现；以评立德,是德治的手段——越丰村的做法正是桐乡“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缩影。  
　　结束乌镇采访返程,经过乌镇牌楼时,同行人提议,停车看看牌楼。站在牌楼下翘首望去,镌刻着“乌镇”两字的牌楼飞檐插向天际,展翅欲飞……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贾宝元陈磊　王春)  
　　**记者手记**  
　　在桐乡采访时,有一个疑问萦绕于记者脑际,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桐乡市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时创新出“三治”基层治理模式?  
　　也就是说,从枫桥到桐乡之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脉络。  
　　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沈云波给出的答案是,随着桐乡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桐乡的发展进入了“阵痛期”。  
　　在他看来,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现,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最后一公里”现象逐步显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  
　　在此背景下,“枫桥经验”成为创新的源泉。  
　　沈云波介绍说,“枫桥经验”的理念是,引导群众、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纠纷,矛盾不上交。桐乡市考虑,在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时,如何能做到关口前移,从源头预防矛盾的产生。2013年,桐乡市坚持问题导向、群众导向,围绕源头性、基础性问题,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采访中,记者体会到,无论是在市级层面,还是在镇级层面、村级层面,大家始终把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贯穿于“三治”建设全过程。  
　　对于记者的体会,桐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曹炳权回应说,桐乡市在创新“枫桥经验”时,始终坚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  
　　他解释说,桐乡市“三治”创新,并不是抛弃原有的“枫桥经验”另起炉灶,而是在坚持“枫桥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结合桐乡实际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民主法治绘就余村山青水绿和美画卷**

**【引子】**  
　　余村电影院很“忙”。这里每天上映的,是一部“两山”理论纪录片。观影者,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去年“票房”达50万人次。余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发源地。十多年来,这一理论如星火燎原,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写进党章。  
 余村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在创建之路上,“枫桥经验”这棵常青树,矗立在青山绿水间,闪烁着一片绿意金光。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  
　　清明前夕的余村,一派诗意风光景致。  
　　站在村口,如置入画卷中,青山环绕,绿水绵延,翠竹掩映,桃李竞艳……一块形似春笋的石头上,镌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个大字,鲜红如霞。  
　　这块石头,记载着余村人为了村强民富、景美人和而奋斗的无眠夜晚,见证着“枫桥经验”在余村薪火相传迈向新时代的光辉轨迹。  
 **民主是传家宝**  
　　“哇!这里负氧离子有4万多个,小心醉氧哦!”  
　　“就是!赶紧深呼吸。”  
　　“装一点,打包带回北京去!”  
　　3月30日下午,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文化礼堂前,来自科技部农村司考察团的年轻人,围着一块显示负氧离子量的电子监测屏,纷纷赞叹,爽朗的笑声回荡在青山绿水间。  
　　下午3点多,在余村电影院一楼“读书角”的桌前,《法制日报》记者见到了村委会主任俞小平,他告诉记者,余村空气好是因为推行了烟花爆竹“双禁”。  
　　禁售禁放烟花爆竹,这是余村去年10月以来的一个“大动作”,还写入了村规民约。  
　　“一开始,心里真没底,老祖宗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习俗,怎么可能说禁就禁?”俞小平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向记者抖搂大实话。

　　但他话锋一转:“我们有一个传家宝,屡试不爽。”  
　　俞小平所说的传家宝,就是抓住“枫桥经验”精髓,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民主协商、民主决策,实现民主自治。  
　　如何应对“双禁”挑战,实现移风易俗?  
　　当然要把“枫桥经验”传家宝搬出来!  
　　俞小平掰着手指,列出了系列举措:村委提前介入,发放倡议书；设立“双禁”警示牌、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提供替代服务,办喜事用鼓,办丧事用锣,用鲜花换爆竹纸钱；给12户“双禁”模范带头户给予表彰；让组建的舞龙队、腰鼓队、锣鼓队巡村,增加年味……  
　　事前考虑得全面,民主讨论得充分,替代措施多样,结果是,从元旦开始,俞小平再也没听到一声烟花爆竹声响。  
　　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将“双禁”写入村规民约。余村的这项先行先试,如法炮制推广到天荒坪镇11个村,实现全域“双禁”。记者听说,镇党委书记赵双勤,还被村民亲切地取了外号叫“赵双禁”。  
　　说到民主决策,俞小平说,早在十多年前,余村就诞生了一项“改天换地”的民主决策——关停矿山、水泥厂,被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评价为“高明之举”。  
　　在一旁看书的老书记鲍新民,也加入了聊天队伍,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2005年8月15日,也是这样的下午,在村委会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鲍新民向习近平汇报了村里关矿停厂的做法。“本来习近平同志是来调研我们民主法治村建设情况的,他听了我们的介绍后,面带微笑但语气果断地说,‘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最后十个字,后来就发展成著名的“两山”理论。  
　　牢记习近平同志当年关于加强村级民主法治建设的嘱托,余村带着“枫桥经验”的传家宝,更加自信坚定地走上了民主管理、依法治村、绿色发展的道路。  
　　俞小平自豪地说:“余村成立了‘两山’议事会,作为民主议事决策的常态协商机制,从自来水收费、家禽圈养、垃圾分类、文明祭祖到全村规划建设,大小事都要通过众人商议后才能做。村里每花一分钱,都公示在‘村村通’电视平台上,随时接受监督。”  
 **法治是新引擎**  
　　在余村村委会大楼前,立着4块石碑,上面分别写着:民主余村、平安余村、法治余村、幸福余村。  
　　安吉县司法局副局长梅利庆带着记者,参观了村里一条长长的法治文化墙,上面集中展示了余村十多年来民主法治建设成果。  
　　村中长廊、农户围墙、路边侧石、休息长椅,随处可见法治漫画、法治谜语,给秀美的余村增添了别样的法治韵味。  
　　村中一间会议室,依旧保持13年前的陈设,成了“两山会址”。  
　　望着会址里的黄桌蓝椅,梅利庆感慨地说:“我们始终不忘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嘱托,不遗余力地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让法治成为余村和谐的新引擎,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  
　　李芳是余村法律顾问,也是余村法治进步的见证者。  
　　一头微卷的短发,穿着粉色呢制料外套,戴着一副框架眼镜,和悬挂在村便民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点的照片那种职业装感觉不同,眼前的她更有邻家阿姨的亲切。  
　　一开口,就透着直爽,李芳说:“我本是余村人,又嫁到余村,家离村委会不远,几分钟就跑到,可以贴近服务。”  
　　早在1996年,余村因为开矿,村集体经济殷实,村干部经常会遇到合同上的问题,就聘请李芳担任村级法律顾问。余村因此也成为全县最早聘请法律顾问的村。  
　　因为说话做事比较公正,赢得了村民们的信赖,村民一碰到什么法律问题都愿意找李芳。  
　　“有时正在炒菜时就要放下锅铲,去接村民的咨询电话,有时半夜里也会接到紧急求助。”李芳笑着告诉记者,从过去的婚姻家庭纠纷、劳动争议、土地纠纷,到如今的旅游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纠纷类型变化,反映了村民法律意识不断提高,遇事找法用法氛围浓厚。  
　　在一起跨村的劳资纠纷中,30名职工为索要工资,多次跟服装企业协商未果,李芳得知情况后,热心地介入调解,帮助达成了分期付款的协议,本打算去集体上访的村民最终决定给企业一个缓冲机会,使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李芳认为,这就是发挥法律顾问引导作用、落实“枫桥经验”精神的典型案例。  
　　在余村党群服务中心,记者发现如今又多了块牌子,去年11月16日,安吉法院“两山”巡回法庭正式揭牌,通过法官驻村、预约办案、多元调解等措施,同时协助开展送法下乡、法律走亲等活动,开启了司法便民利民新时代。  
　　余村党支部书记潘文革感慨地说:“法律顾问、巡回法庭都是推动余村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他们及时参与决策合法审查、合同风险防范、矛盾纠纷法律把关,余村一步步从学会用法走到了习惯用法,村民零上访,自建村以来,村干部从未出现一人有过违法犯罪行为,村民遵纪守法,刑事犯罪率一直保持零基数、零增长。”  
 **平安是护村石**  
　　安吉,取自《诗经》“安且吉兮”,平安是安吉余村最美的底色。  
　　在余村,除了天荒坪派出所入驻的警务室,今年还出现了一项展现“枫桥经验”薪火相传的新工程——“家园卫士”。  
　　余村有3位“家园卫士”,戴金田、王月华、叶红,是安吉公安民警与协警,都是余村人,利用工作优势,守卫余村平安。  
　　“这项工程的推出,和安吉县通讯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分不开。”裘力彬,安吉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一个年轻帅小伙,向记者娓娓道来。  
　　裘力彬说,安吉全县人口46万人,山区面积大,但全局警力只有1552人,如何让防范通讯网络诈骗宣传不留死角,除了借助媒体、发传单等形式外,去年,安吉公安还给每位民警和协辅警下了“死命令”,要求大家通过亲戚、朋友、邻居等关系,发展20名志愿者,开展“传销式”宣传。  
　　效果立竿见影,发案数直线下降,达到60%以上。  
　　在裘力彬看来,这种发动亲朋发展志愿者的方式,就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尤其契合公安“防为主、防为上”的工作方针。  
　　安吉利用民警、协辅警在原籍地和居住地熟悉环境、便于开展工作的优势,打造一批“家园卫士”,在岗时护卫平安,在家时守护家园。  
　　“彬哥,我以后再也不吸毒了,一定好好过日子。”在裘力彬的悉心管教下,令父母痛心不已的青年阿超喜上眉梢,迎来了他的好日子,不仅成功戒毒,而且马上要结婚了。  
　　“以后就有老婆管着他了。”裘力彬说。  
　　像裘力彬一样的“家园卫士”遍布安吉城乡。  
　　给毁林种茶的村民上法制课、在村里巡逻提高见警率、主动参与安全隐患排查……3名家园卫士成了余村平安的新警力。  
　　信息技术,也给余村平安插上智慧翅膀。  
　　在余村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记者看到,一块巨大电子屏幕,显示着余村各个重要路段、区域的实时状况,水库、工业区、文体广场、居民小区,一切尽入眼底。依托“村村通”“村村看”“村村响”“村村用”等信息化载体,余村网格员收集信息及时,处理问题及时,所以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天天都平安。  
　　落实“枫桥经验”,把矛盾尽可能解决在萌芽状态,是余村村干部践行“枫桥经验”为村民服务的基本准则,也是余村幸福公式的重要构成,幸福=平安+民主+法治。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贾宝元　王春　陈磊)  
　　**记者手记**  
　　绿水青山是亿万年前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  
　　绿水青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  
　　靠什么守住绿水青山?靠什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说到底:民主法治。  
　　赵德清是安吉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他曾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教诲。他说,多年来,安吉始终坚持“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不动摇,贯彻落实“两山”理论,通过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追求人和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安吉县天荒坪镇党委委员刘列飞说,随着村民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文明素养大大提高,余村以村规民约为切入点,实现了法治、德治、自治的“三治”融合,守住了绿水青山,也守住了余村人的幸福。村民在绿水青山的美丽环境中收获了金山银山。  
　　民主、法治、平安,构成了余村人幸福的基本要件,也成就了乡村治理的新模式,余村带着“枫桥经验”传家宝,走出了一条绿意金光的康庄大道,绘就了一幅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山水画卷。

**桐庐大数据主动查找纠纷隐患**

有一个地方,只要你去过一次,她就会“记”住你。她叫桐庐,隶属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全域旅游县。她之所以能“记”住你,是因为有一个“超强大脑”——覆盖全县的超大信息库,全县各种信息资源都汇集在这个数据库里,由一个平台统一负责信息处理。  
 桐庐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时,将大数据引入社会治理,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主动发现引发矛盾纠纷的隐患,“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互联网+社会治理”新模式。  
3月的最后一天,《法制日报》记者走进这个“超强大脑”一探究竟。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3月31日午时,记者一行到达杭新景高速桐庐入城口,沿着一条美丽、干净、整洁的大道行驶大约两公里,被誉为桐庐“超级大脑”的桐庐县智慧治理中心就出现在眼前。  
 **联动平台“主动”处置安全隐患**  
　　走进智慧治理中心一楼百姓体验馆,1200平方米的大厅让记者眼前一亮,这里展示着智慧安防、智慧消防、智慧出行等政府探索智慧治理的成果。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迎面一堵屏幕墙。屏幕墙由36块小屏幕组成,横排9块,竖排4块,展示着各类实时监控画面和大数据云图。  
　　智慧治理中心副主任赵波说,桐庐全县8270个视频监控点的信息,都可以随时调取到这块大屏幕上。  
　　其中一块屏幕上,展示的是“国内客源地在桐庐分布图”。  
　　即时信息显示,当时共有29322人来到桐庐,安徽以1315人排名客源地首位,河南居客源地次位,有1170人。  
　　记者注意到,北京有204人在桐庐。旁边一位工作人员笑着说,这204人中,你们几位肯定包括在内,并告诉我们数据的来源是根据我们携带的手机号码的登记地来统计的。  
　　智慧中心二楼,是桐庐县智慧治理信息中心、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等平台,这也是桐庐县的“超级大脑”集中办公场地。  
　　赵波介绍说,桐庐在继承和发展“枫桥经验”过程中,依托“互联网+”机制改革、以大联动为核心、以大数据为支撑,通过“大治理”发现问题,以“大整合”集中各类资源,以“大联动”解决处置事件,探索“互联网+社会治理”桐庐模式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赵波讲了一件事,去年,智慧治理大联动平台接到群众反映:一处道路路口有交通隐患问题。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判后,发现该路口确实存在重大交通安全隐患,智慧治理中心及时联动协调相关部门在该路口设置了交通信号灯等安全设施。  
　　听说此事后,记者急切想到现场一看究竟。  
　　在智慧治理中心督查考评科科长朱林国引领下,记者赶往事发路口——桐君街道圆通路与迎宾路交叉口。  
　　路上,朱林国通过大联动平台信息留痕管理,查询到当时的反映人祝先生并电话联系了他。  
　　大约20分钟后,到达事发路口。记者在这里看到,迎宾路与圆通路交叉成一个“X”形路口,路口以北,圆通路一直上坡。  
　　祝先生已经等在路口,他穿着黑白格子T恤、黑色裤子,脸庞瘦削。去年国庆节期间,他在这里被一辆轿车撞倒。  
　　祝先生回忆,当天晚上八九点,天很黑,他沿着迎宾路准备拐向圆通路,突然从北面开过来一辆轿车,一下子将他撞翻在地。万幸的是,车速较慢,自己没有大碍。  
　　朱林国接过话茬说,过后,祝先生将此事反映给智慧治理中心,还说这里以前也发生过撞人事件。智慧治理中心经过历年大数据分析,发现这里确实发生过多起交通事故。  
　　智慧治理中心随即启动“大联动”机制,协调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勘验,接着在路口设置了信号灯、路灯,在路口画上斑马线,还安装了治安交通电子警察监控。  
 **数据分析“智慧”发现可疑人员**  
　　回到智慧治理中心,记者提出了一个疑问,桐庐是怎样摸索出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呢?  
　　参与智慧治理中心筹建全过程的叶建新,现任智慧治理中心常务副主任。他回忆说,2015年年初,浙江省将桐庐县列为唯一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改革试点县,到底该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呢?经过思考,桐庐将目光转向了互联网,觉得相比传统依靠人进行社会治理,创新应该在于依靠科技手段。  
　　叶建新记得,2015年6月14日,桐庐县开始筹建智慧治理中心,直接向县委县政府负责,“我们没有新增机构,人员也不到10个”。  
　　叶建新解释说,桐庐的考虑是,以智慧治理中心为平台,打破以往职能部门信息各自为政、条块分割,整合全县的信息资源,形成一个覆盖全县的超大信息库。  
　　赵波补充说,在整合过程中,桐庐县由县委政法委牵头,通过智慧治理信息中心将政府掌握的人员机构、热线电话、数据资源以及公共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枫桥经验”是化解已经发生的矛盾,桐庐则是在信息整合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分析主动发现矛盾隐患并加以解决。  
　　“前不久,我们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了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最终,该犯罪嫌疑人被城南派出所民警抓获。”赵波说。  
　　得知这一信息,记者立刻前往桐庐县城南派出所了解具体情况。  
　　在城南派出所,副所长申屠朝斌回忆,2017年12月28日早上8点,他们接到桐庐县110指挥中心指令称,桐庐县客运站安装的人工视频智能系统识别出一名乘客与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相似度极高。  
　　接到指令后,申屠朝斌带领民警驾车前往大约1公里外的客运站。在候车大厅里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转身走出候车大厅,他们来到客运站大门外,看到大门左侧十几米的地方站着一个人,与犯罪嫌疑人衣着、身形很像。申屠朝斌上前盘问“你叫什么名字”,对方报了一个名字,申屠朝斌又问“你是不是张某”,并拿出在逃犯罪嫌疑人照片等资料。张某沉默了片刻,承认了。  
　　“如果各系统信息没有整合在一起,还是各自为政,我们就不能及时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消除矛盾隐患。”赵波说,目前,仅视频监控资源,智慧治理中心已经整合公安、交通、城管等20多个领域8270个视频监控。  
 **互联网为“枫桥经验”插上翅膀**  
　　记者再次回到智慧治理中心,已经接近下班时间。  
　　智慧治理中心二楼大厅显示屏上的信息是:智慧桐庐“967000”百姓热线,“今日接线量128(件),民生类113(件),政务类15(件)”。  
　　赵波指着屏幕说,“我们整合了环保、农林、妇联等22个部门总计47条政务咨询及举报投诉热线,对外形成两条热线,接受群众来电咨询和问题反映,这也成为桐庐县‘超级大脑’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数据。”  
　　他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是,2017年两条受理热线受理话务总量超过10万次。  
　　桐庐为了鼓励群众积极反映信息,出台了《社会治理信息化建设工作考核办法》,鼓励群众及时发现并上报问题隐患,力争在事件处置中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排查隐患在基层,消除隐患在基层。  
　　赵波说,大数据的运用,使桐庐社会治理的诸多领域正在发生变化。他们就曾利用大数据预防了一起旅游安全事件。  
　　2017年9月,桐庐县实行县域内旅游景点门票、民宿免费举措,9月1日9时许,智慧治理中心通过“全域旅游智慧出行管控系统”发现,“瑶琳仙境”景点游客已达1.3万余人,而该景点最大承载量为1.5万人。  
　　赵波记得,为了掌握具体数据,智慧治理中心立即调度无人机,飞往景区方向巡查,发现通往景区的5条道路通行车辆密度较大,数据传回中心后经分析研判,游客将达3万人,超过景区承载能力,会带来严重安全隐患。  
　　智慧治理中心第一时间报告县领导,及时联动辖区乡镇、交警等部门采取相应应急措施,一方面延缓车辆进入景区,一方面引导车辆前往邻近其他4个景点,疏散游客,最终有效处置了该隐患,防止因大量游客进入景区而引起矛盾爆发。  
　　赵波的感受是,桐庐的智慧治理,是将治理手段从传统方式向技术方式转变,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插上“技术翅膀”,打造出基层治理的“枫桥经验”升级版。  
　　离开智慧治理中心之前,记者特别关注道路是否畅通的问题,工作人员将视频监控系统中4块小屏幕切换到杭新景高速桐庐进出口,一眼望去,道路畅通。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贾宝元　陈磊　王春)  
　　**记者手记**  
　　壁垒,古时军营的围墙,用于防御和戒备。  
　　桐庐在整合全县数据之前,各部门自行掌握各自的数据信息,互不联通,互不共享,如同在桐庐大地上建造一个个“信息壁垒”“信息孤岛”。  
　　智慧治理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新感慨道,他们调研时发现,全县整合数据,技术问题不是首要难题,政府部门间的条块分割,“九龙治水”才是最大的障碍。  
　　这不是桐庐一个地方的现象,而是全国普遍面临的难题。  
　　可贵的是,桐庐初步消除了一个个“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  
　　桐庐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施伟告诉记者,桐庐县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时,以问题为导向,借助互联网强势突破各种壁垒,以“大整合”集中各类信息资源于一个数据库,打破了部门“信息壁垒”,联通了“信息孤岛”,对预防矛盾纠纷起到重要作用。  
　　记者手上有一份桐庐县创新社会治理材料,上面有这样一段话:大数据的运用,以发现问题作为实现治理的前提,发现问题的方式的转变标志着治理方式的转变。桐庐在依靠发动群众参与发现隐患的基础上,尽可能通过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手段查找、发现问题隐患,针对问题隐患能及时预警提醒,及时将其消解于无形。  
　　现如今,原本竖立在桐庐各个角落的“信息壁垒”“信息孤岛”已不知所踪。桐庐“超强大脑”正在高速运转。

**大调解助力“无讼”衢江**

**【引子】**  
　　法官是审案子的,这谁都知道。但法官在审理某些案子的时候,也会问原被告愿不愿接受调解。  
 调解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当然了,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或者没有调解成功,法官会及时作出判决。  
 衢江,是浙江省衢州市一个区。衢江区人民法院在司法层面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将调解引入家事审判领域,在判决前化解了97%的家事纠纷。  
 衢江区法院还在诉讼服务中心挂起一块“无讼”牌匾,提醒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从根源上解决纠纷,使当事人自愿不再提起诉讼。  
 在这块“无讼”牌匾下,发生了多少法官化解家事纠纷的故事呢?4月1日,《法制日报》记者走进了衢江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4月的第一天是星期日,记者一行赶到衢州市。  
　　衢江区人民法院位于衢州市信安大道上。  
　　沿着马路边的绿阴道走进法院大门,拾级而上来到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大厅,一块“无讼”牌匾就悬挂在墙壁上。  
　　隶属于诉讼服务中心的家事调解中心负责人吴琳接待了记者。  
　　吴琳一身法官制服,戴一副眼镜,披肩发,看上去文文静静,但一开口快人快语,年纪轻轻已是法院中层骨干。  
 **在柔性氛围中调解群众纠纷**  
　　一走进家事调解中心调解区,记者眼前一亮:米黄色墙面、窗阔室亮,左边墙上挂着一幅幅全家福照片,右边是一些温馨提示语。  
　　吴琳介绍说,墙面颜色设计以温馨色调为主,目的是让当事人来到这里后能够放松心情。  
　　调解区中央是一张椭圆形大桌子,记者注意到,桌子上的席位牌很特别,是“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等家庭身份。  
　　“我们以家庭身份的席位牌代替‘原告’‘被告’等称呼,是为了营造家事纠纷化解的柔性氛围。”吴琳这样解释。  
　　吴琳给记者讲了一个今年发生在这里的调解故事:  
　　衢江区高家镇欧塘村村民徐银六与哥哥徐银松住邻居。兄弟俩曾经因地界问题闹得很不愉快,后来经村干部主持调解,双方约定纠纷地块归弟弟使用,但若改建则必须通知哥哥。2017年2月的一天,徐银六站在一架“人字梯”上砌围墙,但他把墙建到了纠纷地块上。  
　　徐银六的嫂子王女士发现后,从“人字梯”另一端爬上去,要把墙砖往下扒,徐银六用手挡住。争执中,“人字梯”断裂,王女士从梯子上掉落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花去几万元医疗费。  
　　2017年12月,王女士将徐银六起诉至衢江区法院,要求小叔子赔偿医药费及相关损失。案件随后转到家事调解中心处理。  
　　吴琳回忆,案件定在今年3月初的一天开庭调解,开庭前一天,她给衢州市民、特邀调解员苏阳松打电话,希望他能作为社会乡贤参与案件调解。  
　　苏阳松家曾经获得“全国文明家庭”称号,在当地很有影响。  
　　在吴琳讲调解故事前,苏阳松已经被请到了家事调解中心。年届70岁的他穿着便装,安静地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  
　　苏阳松告诉记者,接到吴琳电话后,他当天下午赶到法院,看了案卷材料,心里有了底儿。  
　　第二天开庭调解,王女士的丈夫徐银松也到庭参加。苏阳松对他们夫妇说,“父母不在了,在大家庭里,长兄为父,要像父亲一样对待弟弟妹妹,作为长子,要吃得起亏,何况你是村里的老党员,更应该发挥党员带头作用。我也是长子,妹妹弟弟总共9家人,很多时候,我都是让着他们的。”  
　　苏阳松又对徐银六说,兄弟之间要互相尊重,兄友弟恭,你砌墙砌到哥哥的地界上,本应该通知你大哥一声,你没有通知就自行砌墙,就是没有尊重你大哥,你嫂子还因为这事儿摔伤了,更是你的不对。  
　　一番话让双方心服口服,这起纠纷得以化解。随后,经过吴琳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徐银六向嫂子道歉,补偿嫂子1.5万元,兄弟之间握手和解。  
 **社会乡贤断清父子家务事**  
　　吴琳介绍,衢江区法院家事调解中心设立不久,苏阳松就开始参与案件调解,她印象深刻的是一起父子多年积怨引发的纠纷。  
　　当时,这起纠纷的主审法官是柴宏玮,现在已经是衢江区法院杜泽法庭负责人。  
　　经吴琳联系,柴宏玮来到家事调解中心,和苏阳松一起陪同记者到衢江区上岩头村,采访这起纠纷的当事人胡卸富。  
　　胡卸富的家在上岩头村村边,紧挨着公路,是一座白色4层小楼,2层以上每层走廊外都围着半米左右高的镂空栏杆,栏杆上装饰着金色小狮子。  
　　今年79岁的胡卸富头发全白,上身穿着一件长袖T恤,下身穿一条黑色裤子,站在自家大门口迎接记者一行。  
　　走进堂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幅“迎客松”年画。堂屋正中央,是一张四四方方的八仙桌。  
　　围坐在八仙桌四周,胡卸富说起之前自己跟大儿子的官司颇感无奈。  
　　老人有两子两女,均已成家,原本与大儿子一家关系和睦,后来因土地补偿款分配不均等问题产生矛盾。大儿子一气之下,多年不与父亲来往。  
　　近年来,胡卸富连着3次因病住院,自费部分医药费5.6万余元,其中自己承担1.6万余元,其余部分由次子承担。  
　　按照当地习俗,老人生病住院,费用应该由两个儿子分担。胡卸富住院期间找过大儿子,但大儿子“一分钱不给”。  
　　村里知道胡家父子之间的纠纷后,主动前来调解,但几次调解都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村干部建议胡卸富去法院起诉。  
　　“没事儿谁喜欢上法院?”胡卸富说。  
　　2017年3月,胡卸富向衢江区法院提起诉讼,案件由柴宏玮负责,根据案情,他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同时对双方进行了几次调解,但进展缓慢。  
　　坐在记者身边的柴宏玮对记者说,他仔细分析案件之后,发现此案牵涉家庭成员之间多重矛盾,如果判决结案,势必让彼此积怨更深。  
　　柴宏玮调整了调解方式,组织了10名社会乡贤组成调解观察团旁听,在了解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发表调解意见。  
　　当天调解时,调解观察团向被告强调了“羊跪乳,鸦反哺”的道理:“子女理应孝敬、赡养父母,不能与父母斤斤计较,否则,子欲养,亲不在,悔之晚矣!”  
　　同时,调解观察团也劝告胡卸富:“做父母的,还是要一碗水端平,不能厚此薄彼。”  
　　被告深受感动,在观察团成员的鼓励下站起来叫了一声“爸爸”。  
　　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由法院予以确认。家庭多年积怨终于化解。  
　　记者问起近况,胡卸富高兴地说,去年12月,他的老伴儿生病住院,大儿子主动到医院陪护照顾。  
 **引入儒家文化践行“枫桥经验”**  
　　离开胡家,记者同苏阳松、柴宏玮一道返回衢江区法院,在家事调解中心见到了等在这里的院长程品方。  
　　程品方穿着白衬衣,戴一副黑框眼镜,言谈举止透着儒雅之气。  
　　他首先将思路引向2500年前。《论语·颜渊》中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审理案件,我跟别人是一样的,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  
　　程品方解释说,对法官来说,判案很简单,按照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下份判决书就行了。但案子判了,问题没解决,矛盾没化解,走一趟诉讼程序又有什么意义呢?  
　　为实现案结事了,程品方把目光投向“南孔”儒家文化。  
　　站在旁边的吴琳补充说,衢州是“南孔”圣地,自宋代孔端友“扈跸南渡”后,孔子后裔在此传衍近三十世,孔子的思想内核在衢州很有影响。  
　　程品方说,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如何在司法层面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也是衢江区法院要考虑的问题。“无讼”是从情理上说服当事人,从根源上解决纠纷,使当事人自愿不再提起诉讼,与“枫桥经验”并行不悖。  
　　吴琳回忆说,2016年,衢江区法院组建了家事调解中心,专业化调解婚姻家庭、继承、相邻关系以及侵权等民事纠纷。  
　　她还介绍了这样做的背景:同年,浙江省开始倡导“大调解”,衢江区法院在这基础上提出纠纷递进式化解的新概念,就是在诉前,由法官、调解员先调解,法官对调解员法理不明的地方进行指导,使调解员在调解时向当事人释明法理、讲清情理,尽可能将矛盾纠纷化解。  
　　吴琳告诉记者,为此,家事调解中心邀请获得“中国好人”“浙江好人”“最美衢州人”等荣誉称号的热心人士,加盟特邀调解员团队,参与案件调解。  
　　采访结束前,法院工作人员递给记者一份材料,材料里有这么一组数字:2017年,衢江区法院83.5%的民事案件在诉讼服务中心快速化解,民事调撤率81.2%,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80.1%。  
　　看到这份材料,记者立刻想起那块刻有“无讼”的牌匾。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贾宝元　陈磊　王春)  
**记者手记**  
　　明朝末年,文学家冯梦龙借《喻世明言》感慨,“清官难断家事”。  
　　家事之难,难在其中不仅有现实纠葛,更有过往恩怨,如果理不清来龙去脉,不但解不开人的“心结”,还容易导致矛盾激化。  
　　这一点,已为众多案例所证实。  
　　家事不是小事,一旦家事纠纷解决不好,对内影响家庭安宁,对外则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人们才祈求,家和万事兴,家固天下安。  
　　可以说,衢江区法院设立家事调解中心,在家事审判领域引入调解,在判决前化解家事纠纷,正是抓住了关键。  
　　正如衢州市政协副主席、衢江区委书记吴江平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衢江法院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探索家事纠纷联合调解,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从源头上补齐了社会风险防控的短板。  
　　从促进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的角度看,通过家事调解实现“无讼”,功莫大焉。

**村务监委会成新时代乡村治理标配**

**【引子】**  
　　《后陈月报》第7期出刊了。  
　　一张薄薄的彩印A3纸,集合了新鲜烫手的村情、党务、财务,每月由党员亲手送到农户家中,成了村务公开的新渠道。  
　　后陈村是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发源地。2004年,全国首个村务监委会在后陈村挂牌成立。2010年,“后陈经验”被写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还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村务监委会,这项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乡土发明,是怎样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标配的?  
　　为了解题,记者一行走进了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绿树掩映,红旗飘扬,一幢白色簇新大楼,是后陈村标志性建筑,后陈村村委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里。  
　　办公楼门口挂着村委会门牌,在它旁边,还挂着一块白色镶金角花边的门牌,上书: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  
　　走进一楼大厅,记者就被一张巨幅合影照片所吸引。那是2005年6月17日,后陈村村务监委会诞生一周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与市、县领导及街道、村干部的亲切合影。  
 **监委会是创新枫桥经验之举**  
　　端详巨幅照片,发现参加合影的有位女性,她站在习近平同志左手边第三个,短发,穿红黑格子衫,黑裤,凉鞋。后陈村党支部书记陈忠武说:“她就是陈玉球,是当年村中参加合影的唯一女干部,现在是后陈村史上第一任女监委会主任。”  
　　“这个村监委主任可不好当,我们三年一届,14年来共换了6个主任,从来没有连任的,因为这是得罪人的差事。”陈忠武性格憨爽,在二楼会议室里一落座,就直接替这位女监委主任介绍起来历:“她是我们村任职最长的干部,干了30多年了,我1986年去当兵时,她就已经在村里当副大队长了,还敲锣打鼓地为我送行……”  
　　“她不怕苦、不怕累,任劳任怨,老百姓对她很放心。”陈忠武补充说,关键是性格直爽,很多事情她认为不对,全都指出来,村民有什么事都习惯找她反映。  
　　听着陈书记的赞扬话,坐在一旁的、依然是一头短发的陈玉球有点腼腆。  
　　陈玉球原先在村里负责计划生育和卫生,自选上村监委主任后,她更忙了,村里拆迁项目要参与,工程项目要跟进,每一张发票都要签字,每月15日还要向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述职,讲述财务开支明细,并通过月报的形式发给村民,村民有意见,再带回到会上来。  
　　月报的学名叫《后陈月报》,全村365户人家,每家一份。  
　　第一期月报创刊于去年9月,财务公开板块是一排密密如织的表格,每一笔都有时间、经手人、内容,细到5元钱的三轮车补胎费。  
　　月报右上方,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关注公众号“后陈之窗”,获取实时信息。  
　　“有了月报,村民不用打开电视看,也不用到村里来看了。”陈玉球告诉记者,全民参与村务管理的气氛很浓,有时党员将月报发到村民手里稍微迟一点,就会来跟我讲,我家月报怎么还没有来?  
　　对于村务公开的重要性,陈光武有着切身体会,他毫不隐晦地告诉记者:“村务监委会成立前,我担任村主任,也给村里干了不少事,但村民认为我这么卖力,肯定捞了很多钱,起码几十万,最终上级查明这些都是子虚乌有,还了我清白。”  
　　陈光武长舒一口气说:“其实农民是最朴实的,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在村务管理中享有一个知情权,公开、透明,老百姓就支持你。”  
　　在场的武义县委深化“后陈经验”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徐一威接过话茬说:“村务监委会,在村级民主监督管理方面就是发挥这样的作用,给村干部一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白,是‘枫桥经验’的深化创新。”  
　　徐一威介绍说,从最初的村务财务理财小组,到全面开展阳光村务,再到如今以村务监督委员会为履职平台,建立双述职两反馈机制,后陈村村务公开已经做到3.0版,在此基础上还将构建一套村务监督标准体系,进一步提高村务监督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监委会让村干部变得规矩了**  
　　在村委大楼后面,是一片清澈的湖,一座三孔拱桥横跨湖面,穿过一幢幢红瓦粉墙的四层新楼,记者找到了村委会老楼——后陈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门前一副红色对联,一组二十四孝图,门内是郁郁葱葱的绿植。  
　　村务监督委员会,就诞生在这幢三层老楼里。  
　　2004年6月18日,后陈村村民代表大会,就在这里表决通过了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和《村务监督制度》,选举产生了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并正式挂牌。  
　　如今,监委会的牌子已被“后陈村老年人分会”所代替。  
　　记者来这里是想采访一个人,他叫徐岳祥,是第四任村监委会主任。  
　　见到徐岳祥时,他正系着围裙,在老楼后面的食堂里忙碌着准备晚餐。从2014年开始,后陈村建起了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全村70岁以上老人可以在这里免费享用三餐。  
 放下手头的活儿,他的思绪回到了14年前,“习近平同志在村里召开座谈会时,我作为党员代表参加,就坐在他斜对面,我看到他手里拿了我们‘两项制度’的黄色小册子,边听介绍边认真翻看起来。当听到我们说这册子每家每户都有,习近平说,‘这就是村里的王法了,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村民,都是要去遵守的’。”  
　　这句话,让徐岳祥印象深刻。  
　　这句话,也让徐岳祥始终坚信依法用权,遵守村规民约,担负好监委会主任的职责,对一个村的安定团结至关重要。他认为,盯牢村民关心的“三资”即资源、资产、资金问题,按规定去落实管理,按规定去监督到位,问题解决了,就是真正贯彻落实好“枫桥经验”了。  
　　结束对徐岳祥的采访,归途中,记者问陈玉球:“监委会对村干部监督作用有多大?”  
　　陈玉球想了想,说起一个人,这个人是陈玉球搭档,叫朱岳祥,是现任监委会委员,一直参与旧城改造、土地流转等各种村中事务的监督。  
　　朱岳祥本是泥水工,因为懂行,常被陈玉球安排去给村里来的工程进行质量把关,提出建议,例如石块多少钱、运了多少车、村干部几点上下班,都要记录下来。  
　　“村里买水泥、砖块,我们也要一起去还价。”陈玉球说,去年6月,有个村干部让家人给自己顶班,照报误工费,接到反映,我们核实后当即把这事给否了,后来这个村干部主动辞职。  
　　“应该说,类似监督无处不在,作用很大。”陈玉球说,比如在分配宅基地过程中,事前就邀请村务监委会成员列席参加；事中确定名单后上墙公布,同时公布监委会主任电话；事后还要由监委会审核,确认名单是否体现全村住房最困难农户。  
　　陈忠武道出他的直观感受:“有了监委会后,村干部都好当起来。村务管理从以前的事后监督,到现在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从盯钱、盯事到盯人,治理水平得到提升,村干部变得规规矩矩了。”  
　　村主任陈跃富也深有同感:“现在村里做任何事都要合法合规,我的职责就是按规矩办事,落实好村里的各项事务。我经常跟陈玉球说‘你可要把我们监督好,监督好就是帮助我们’。”  
 **监委会发展检察机关功不可没**  
　　14年来,后陈村实现了4个“零”:群众零上访、干部零违纪、群众零投诉、违规收入零入账,后陈村也成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武义县深化“后陈经验”,将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向其他领域延伸,全面推行居务、校务、院务、企务监督制度,实现了城市社区、公立学校、公办医院、国有企业监督委员会全覆盖。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后陈经验”的诞生、发展、完善,与检察机关密不可分。  
　　在武义县人民检察院503办公室,记者见到了现任武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时任武义县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涂立中。  
　　这位当了十余年反贪局长的“老检察”,回忆起当年村干部经济犯罪屡查不绝的势头,仍记忆犹新。  
　　“老百姓当时说我们检察官只会抓村官。其实我们查处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根本。”涂立中说,2004年初,武义查处了白洋街道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李某某受贿案。案子结了,却发现反映村干部的举报信越来越多,他们直指村务管理混乱,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不到保障。  
　　类似村官贪污受贿发案原因,让涂立中深感忧虑,于是向白洋街道党委发出一份检察建议书,建议加强村务监督机制建设,规范村务管理工作。  
　　在武义县经济商务局一间小会议室里,调研员、时任白洋街道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向阳告诉记者,检察院不仅郑重其事地发出检察建议,还主动上门与街道主要领导沟通,让街道党委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一年内全街道5名村书记因经济问题被处理,而且有火烧连营之势,已经严重影响到街道工作开展,村干部经济问题确实需要对症下药。  
　　徐向阳介绍,街道在后陈村建立“财务管理小组”试点,此后不久,后陈村土生土长的白洋街道工办副主任胡文法被下派担任该村村支书。经过检察建议的提醒,在县有关部门的牵头下,武义县在后陈村进行村务管理工作的探索,开创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先河。  
　　此后,武义县检察院一直关注着“后陈经验”的发展变化。根据村干部案件查处情况,先后形成了《关于“惠民涉农”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调查分析》和《村务监督模式的构建及完善建议》两篇报告、建议,从建立健全选人用人制度、监委会独立行使职权制度、对监委会工作的监督制度、建立健全监委会制度法律体系等方面来进一步保证制度的切实执行,均被县委采纳,由此推出了多个更加完善的制度。  
　　对于今后的工作,武义县检察院检察长陈世河说:“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为契机,立足检察职能,发挥‘后陈经验’诞生地地缘优势,继续探索总结提炼新时代‘后陈经验’,为推进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为手段开展乡村善治体系创新实践提供检察经验、贡献检察力量。”  
　　在武义县采访期间,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温暖的阳光下,武义美景清晰可见……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贾宝元王春　陈磊)  
**记者手记**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这句话,在武义县后陈村得到了生动印证。  
　　村务监督委员会刚成立时,曾饱受争议。2005年6月17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后陈村调研时指出,“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是积极的,是有意义的,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为后陈村的改革正了名,鼓了劲。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深化完善“后陈经验”作出重要批示、指示。  
　　沿着习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后陈经验”不断焕发旺盛生命力,后陈村创造了“四零”纪录,村集体经济增长41倍,村民人均收入翻两番,成为村风和谐、村容洁美、村民富裕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武义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曹向阳说,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后陈村的发展表明,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使农村基层治理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能人治村”的传统治理模式逐渐转变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方式,乡村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这,无疑是对“枫桥经验”的创新和发展。  
　　后陈经验,后劲十足。

**松阳民情地图成基层干部工作法宝**

**【引子】**  
　　在松阳县,如果干部去村里找人,不认路,怎么办?有一法宝——民情地图。松阳民情地图是通达民情、服务民生、维护平安、促进发展之图,上面记载着与老百姓相关的各种信息。  
 几年间,松阳的2046张手绘民情地图,已升级为“电子地图”。如今,民情地图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已成为浙江首个基层联系群众的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并成功申报了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国家级标准化试点。  
 松阳坚持和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贴近民声,打通了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摸索出了一条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新路。  
 民情地图,引导着记者走进松阳。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清明节前,暖春艳阳,茶农们的手在一片绿叶丛中飞舞着,采摘茶芽……这一场景在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的乡镇随处可见。  
　　4月3日,记者在松阳县象溪镇、新兴镇等地采访时发现,有一名词被基层干部不断提及,这就是:民情地图。  
　　别看这小小一张图,如今已然成了“民情大数据”信息系统,通过村情数字化、资源信息化、服务结构化,“民情地图促服务”实现全方位、立体式的全新格局。  
 **熟悉民情连民心**  
　　村前潺潺流过的松阴溪,村后环绕的青山丛林、碧绿茶园,村中统一规划建设的楼房,高氏宗祠、朱熹讲学原址、文昌阁等古民居古建筑镶嵌其间,让象溪一村充满文化气息。  
　　驻村干部江美玲穿着一身休闲装,扎着马尾辫,介绍起象溪一村的历史如数家珍:这里曾出过3位进士、5位举人和85位秀才,素有“进士村”“耕读村”的美誉。  
　　2016年10月,江美玲成了象溪一村的驻村干部,很快就熟悉了村里的情况。“户籍人口900,常住人口是723。”遇有人问,她便脱口而出。  
　　能够迅速熟悉村情,民情地图功不可没。  
　　民情地图包括村情民情图、产业发展图、结对帮扶图、防灾避险图等6张地图。  
　　通过一张结对帮扶图,江美玲了解到,朱熹讲学原址里住着残疾人周聪香,就经常跑去问问有什么需要,还帮她联系了来料加工。  
　　古宅里,穿着鲜绿色毛衣的周聪香坐在轮椅上,戴着一副红框眼镜,正埋头镶嵌一幅珠画,蓝色孔雀跃然图中。  
　　“小江,你来了。”抬头看见江美玲,周聪香笑得合不拢嘴。  
　　前段时间,周聪香的轮椅坏了,江美玲帮她及时与县残联联系更换,周聪香带有几分感激地评价:“小江人很好的!”  
　　这次,周聪香咨询了申请产业帮扶的问题,江美玲耐心作答。  
　　像周聪香这样需要帮扶的家庭,在民情地图上都有标注。  
　　“之前有个残疾户补贴问题要解决,我就先通过信息系统里的这张图,把村里残疾户一户一户点进去,一户一户地看,并知道每户房子大体位置,再一户一户上门登记,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否则就是盲人摸象。”江美玲说。  
　　谁想出了民情地图这个点子?  
　　松阳县委组织部电教中心主任鲍李伟接过话茬,讲起民情地图源起:早在2010年4月,在松阳县四都乡,干部去村里开展网格式管理、组团式服务。谁料,干部到了村里不认路,经常找不到人。当时,乡里就讨论,让干部到村里去,先把房子画清楚,再把住哪些人弄清楚。民情地图的初步模型,就这样出来了。  
　　“有了民情地图,驻村干部心里有了一本明细账,对隐患能够预知预防,人员也能够快速反应,服务更能贴近群众需求。”象溪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兰丽燕告诉记者,去年,象溪镇借助民情地图,完成4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房屋拆除及人员搬迁,两个隐患点工程治理,C类、D类危旧房修缮26幢,村民居住环境大为改观。  
 **熟门熟路解民忧**  
　　松阳县新兴镇上安村是远近文明的茶乡。  
　　村口,就是一个茶青交易市场。附近的茶农,将采摘好的鲜叶运到这里集中买卖,人声鼎沸,车水马龙。  
　　茶叶采摘季节,是上安村党支部书记袁启章每年最忙的时候。  
　　“全村95%的村民从事茶产业,从种植、采摘到加工一条龙。这个时候,村民最关心的是能否抢到采茶工、茶叶能否早点采下来,家家户户忙着赚钱,根本无暇吵架、赌博。”袁启章笑着说。  
　　村委会二楼办公室的墙面上,悬挂着6张图,其中的产业发展图吸引了记者。村口的茶青交易市场就在图中,市场旁是古谢公路,公路两边密密写满了农户,户名、亩数、专业合作社等数据。  
　　刚走访回来的住村干部潘标,接手工作不满一个月,他指着这张产业发展图说,依托这张图,他挨家做足功课,一圈下来,这家住哪儿、有几口人、几亩地、种了什么茶、规模产量如何,都烂熟于心。  
　　除了核对地图信息,潘标趁机宣传清明节前烟花爆竹禁放政策。在走访中,他还发现,60岁的村民刘成荣独身一人,存款被一场病耗没了,生活困难。走访回来,潘标就帮老人申请了低保。  
　　“通过走访,可以了解困难户的情况,然后记录在本子上,回来后在系统里完善。通过反复走访,就把民情地图刻画在脑海中。”说起民情地图的妙用,潘标有些兴奋,“有一次,还用地图帮助一位痴呆老人找到了家”。  
　　“民情地图在协助我们调解纠纷时立了大功。”顺着潘标说的妙用,袁启章说起一个故事。  
　　那是一起医患纠纷调解。尽管镇里的老娘舅调解组织介入多时,但患者刘某就是认为医院有问题,什么道理都听不进去,调解没进展。  
　　“最后,我们通过民情地图发现,刘某的一名亲友是医生,由他出面解释,结果当场就将纠纷圆满化解。”袁启章说。  
　　待记者喝一口刚泡的新茶,新兴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李艳打开话匣子:“乡镇干部要全面掌握村情民情,还要参加闭卷考试、现场问答。比如房子对应住着什么人,干部人人都得有一双火眼金睛,熟门熟路、知根知底,练成活档案。”  
　　李艳说,为了检验干部对村情民意的熟悉程度,松阳建立了月查、季督查和年度大比武工作机制,每月由乡镇组织一次应知应会能力理论考试,每季度由县级层面组织一次督查,每年举行一届全县大比武,考评乡镇干部走村入户联系服务群众情况。  
　　民情地图大比武不仅涉及乡镇年度考核,还成了展示乡镇干部能力和风采的大舞台,成为松阳基层干部一年一度的“春晚”。  
 **社会治理标准化**  
　　在采访中,鲍李伟告诉记者一个喜讯:由松阳县县委组织部承担、浙江省标准化院提供技术支持,松阳的基层社会综合治理标准化试点,以96分高分通过国标委的验收。  
　　“这意味着浙江以‘民情地图促服务’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标准化模式得到国家的高度认可。”鲍李伟说,以民情地图为工作载体,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录入松阳全县401个行政村、21.4万农户的8000多万项信息,构建起“民情大数据”。  
　　采访中,记者得知,浙江省标准化院也将“标准化+”理念融入民情地图,通过制定《结对帮扶服务规范》《民情诉求处理规范》等一批核心标准,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和规范化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实现了良好的治理成效。  
　　在松阳县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记者看到平安建设信息系统的实时运作情况,包括线索管理、实有人口、组织场所、实有房屋、日常办公、事件处理、研判分析、数据管理等条块内容,都与民情地图地理信息系统连通着。  
　　松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李文军说,松阳将民情地图作为助力党建统领“四个平台”建设的重要抓手,强化党群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和研判,提升为民服务水平,让信息反映更全了,干部作风更实了,事件处理更快了。  
　　在指挥中心办公桌上,摆放着《标准化手册》《网格员工作手册》等规范标准和汇编资料,系统介绍“四个平台”概念、组织架构、职责任务等内容,明确网格设置标准、岗位职责和任务清单等工作标准。  
　　李文军说,“规范标准化,将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岗位执行能力。依托完善的民情地图基础与日常巡逻,网格员可以随时将发现的信息及时上报到综合信息指挥室,继而研判、交办、处理各类基层问题”。  
　　“平安建设信息系统与民情地图的数据进行有效融合,有利于相互促进,更好地开展工作。”松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平安办主任包金付说,民情地图是坚持“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的一个创新载体,希望通过治理标准化,固化成为可复制的经验,努力形成具有集成化、智慧化、标准化特色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贾宝元　王春　陈磊)  
**记者手记**  
　　一张地图,记录着民情,承载着民生。  
　　顺着这张民情地图,基层干部能够清楚知道农户的家庭基础信息、产业状况,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准确定位,对症施策,让农户通过奋斗,摆脱贫穷,过上幸福的生活。  
　　更可贵的是,这不仅仅是松阳一隅的地图。这张图可量化、可复制、可推广,正在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标准化体系。  
　　民情地图的这些妙用,正是其核心要义的彰显:用脚步丈量民情,深入联系群众,更加直接地服务群众。而这,正是“枫桥经验”的灵魂。  
　　可以预见,松阳县这一创新“枫桥经验”的做法,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治理手段,为探索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如今,民情地图已“走出”松阳,仅丽水市就绘制了1.6万张这样的民情地图。

**台州网格化管理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

**【引子】**  
　　“她,身穿蓝色背心,那像天空一样纯粹的蓝色,步履匆匆地行走在村间的小路上……”  
 “网格员就像古代深宅大院里的大管家,她每天早出晚归,要知道村里有几家是外来户,要知道几家出租房里有没有电线套管,村里几家是危房,还要定期去看望村里的困难户和精神病人……”  
 没看到传说中的网格员,却先看到浙江省台州市蓬街镇五联村一位小学生的作文——《我的妈妈是网格员》。  
 在这名小学生笔下,妈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天在村子里奔波忙碌,家家的事情都要管,有的时候,人们烦她,但更多的时候,人们爱她,需要她。  
 这篇发到记者手机上的作文,开启了记者为期3天的台州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发现之旅。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台州具有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如果从三国时期正式建郡算起,这里已历经了近2000年的沧桑巨变。  
　　近年来,台州又有了新变化,这一变化被称为“网格化管理”。台州的0.9411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划分为7369个网格,由7369名专职网格员和众多兼职网格员管理。  
　　管得怎么样?效果又如何?记者走进台州一探究竟。  
 **网格化 从末梢神经到中枢神经(末梢---中枢)**  
　　记者走访的第一站是台州市路桥区。路桥区政法委书记金晖是个身材高大,看上去让人很有安全感的中年汉子,他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路桥区的网格化管理你随便走,随便看,暗访也行,我不怕”。  
　　很快记者就明白了金晖说这话的底气从何而来。  
　　记者随手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服务单,在这份服务单上,可以清晰得知,发生在村里的一件小事是如何规范处理的。  
　　事情起因:网格员在巡查时发现五区24号出租屋没有安装报警铃,灭火器缺少,没有安装烟雾警报器。服务单显示,2018年1月17日10时36分,网格员潘雪花将此事录入信息网络系统。10时37分,潘雪花上报横街镇。10时45分,横街镇干部黄旺一受理。11时8分,黄旺一将此事交综治工作平台调解。14点38分,黄旺一留言,“政法办会同司法所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调解协议书”。整个事件处理精确到分,细致到人。  
　　“这只是网格员日常处理的一个普通事件。”金晖说,所有案件处理流程都一样,要求件件有结果,事事有着落。  
　　从金晖的介绍中,记者得知,网格员每天都会对自己管辖区的网格巡查4个小时以上,在巡查过程中,一旦发现各种安全隐患和治安问题,能够自己处理的就自己处理,不能自己处理,或群众不配合的,网格员会马上通过网络系统向村里、镇里报送,镇里不能处理的也会向区里报送。处理这些案事件台州有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大平台”,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所有案事件基本都会消化在这四大平台上。每一个网格都是一个基层治理单元,这些网格就像人的末梢神经一样,灵敏地接收着城市乡村每个角落、每个细胞的信息,并迅速向中枢神经传导,推动社会治理各层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金晖不无骄傲地说,我们网络化管理就是对“枫桥经验”的创新与发展。通过我们网格员深入细致的工作,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90%以上的案事件都能做到不出村,自我处理。  
 **网格员 具有“无所不能”好本事**  
　　记者见到的第一个网格员叫王晓,是横街镇份水村的外来媳妇,初见面时她有些腼腆,说话都不敢看人,但一说起她管理的网格,态度马上就从容了很多。  
　　“我管的这片2.42平方公里,310户人家,出租房106户,外来人口430多人……”王晓对辖区的情况了如指掌。她说最难管的是出租房的租客,刚刚掌握了这个租客的情况,明天又换了新租客,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王晓谈起做网格员的经历,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她是外来媳妇,村里的很多人都不认识她,当了网格员以后她想开展工作,管点事儿,村里人张口就是“你谁呀”?没办法,她以后再巡查就把儿子也抱上,村里人见孩子可爱,就凑上来问,爸爸是谁呀,爷爷是谁呀,渐渐地大家熟了,她再做点什么,村里人就很配合了。  
　　记者问她,你们村对流动人口管理这么严,如果看到我一个陌生人在村子里闲逛,你会管我吗?  
　　王晓说,你不是村里人,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会主动问你是要找人还是租房?  
　　记者说,我什么都不做就是四处走走你会跟着我吗?  
　　王晓不说话了,只是笑。  
　　旁边的镇党委书记汪文菊接上话来说,哪里用她跟着你,你在村里走,村里到处都是王晓发展的兼职网格员、志愿者,他们会通过手机群把你的行动告诉王晓,想做坏事是不行的。  
　　汪文菊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在新桥镇东蓬村,记者见到了好几个网格员,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只有25岁,个个都对网格员的工作充满了热情,聊起来就收不住。  
　　管保才,40多岁的汉子,眼睛亮亮的,间或闪过一丝狡黠。他上来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抓贼的故事。“我们管氏宗族宴会,来了好几百人,虽然很多人都是从外地来的,也不是都认识,但我还是一眼就发现了一个偷酒的蟊贼,马上就打电话叫警察把他抓了。这就是网格员的本事”。  
　　林正云看上去就低调多了,她是个皮肤黑黑、短头发的中年妇女,说起话来很有水平。她说我们网格员每天在村里跑来跑去,管东管西,谁家防火不达标了,谁家出租房没登记了,我们都要说几句。特别是外来人口,我们管得多了,人家难免抵触。所以,我们就多为他们服务,村里的外来人口都是白天上班,晚上才能回家。我就晚上去找他们,有时候都半夜了他们才回来,我利用手机网络服务系统帮他们办居住证,这样他们就不用自己来回跑,省了不少时间。上级给妇女做免费的两癌筛查,我就在群里发信息给她们,让她们去做体检。大家一看我是真心帮他们,将心比心,对我也就不再抵触了,相反还会主动给我提供信息,成了我的兼职网格员。  
　　林正云说,我们网格员还管村里的矛盾纠纷,谁家打架了,路上出了交通剐蹭事故,我们都是第一个到场调解,安抚双方情绪,即使我们解决不了问题,但只要有我们在场,双方就打不起来,矛盾不会升级恶化。  
　　25岁的十甲陈村网格员林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不少,一直一言不发地躲在一边,记者以为她害羞,就主动引她说话:“你这么小也会调解矛盾吗?大家听你的吗?”  
　　没想到林媛一开口就吓了记者一跳,不但语调高、语速快,而且思路清晰,思维敏捷。“我不会调解没关系呀,我们村有合和案库”。  
　　合和案库是十甲陈村这些年来积累的各种民事纠纷调解案例,这些案例成功地指导林媛调解了一起邻里纠纷:  
　　两个村民发生纠纷打了起来,其中一个被打折了肋骨,这下不得了,受伤的村民闹个没完,非要赔十万,另一个则咬紧了牙一分不赔。  
　　林媛翻查了村里的合和案库,找到之前也有村民指骨被打骨折的案例,那起案子经过调解,打人一方赔了4万。打人的村民看了案例无话可说,知道不按规矩办事,在村里就没法混了,只好答应赔4万,而被打的一方也表示了不再纠缠。  
　　这件事用金晖书记的话说就是,小姑娘也能办成大事情。  
 **蓝马甲 游走在人群中的安全阀**  
　　为了进一步了解网格员的工作,记者决定在村里跟着网格员跑半天。  
　　一大早我们就赶到了坦田村,不曾想村委会大门紧锁,我们碰壁了。等了一会儿,才看到一个身穿蓝马甲的女子小跑着赶来。一边开门一边气喘吁吁地给我们道歉。  
　　这位网格员叫应秋燕,36岁。问起迟到的原因,她说村里有一幢出租楼总锁着门,她已经盯了一个星期了。“他们锁门一定是害怕消防检查,他们的消防安全一定不合格。我昨天在门上留了条,再不开门我就上报了。结果今天他们就开门了”。应秋燕一早跑到出租楼那里,等对方开了门,就给消防部门打了电话,让消防人员过来检查。  
　　正说着话,两名身穿制服的消防人员开车过来了,一声招呼,大家一起上车,连检查带下发整改通知用了不到20分钟。  
　　跟着应秋燕在村里转,总会遇到打招呼的村民。  
　　走了没几步,应秋燕忽然闪身钻进了路边一户人家,记者跟进去,看到一对老夫妇正拉着应秋燕说话。见了我们,老人用当地方言热情地对我们说了好多话,记者大概地听懂老人在夸应秋燕人好心善,经常来看他们。  
　　应秋燕说,两位老人独居,她每天巡查路过这里就会和老人聊聊天,一是怕老人孤独,二是看看老人家里有什么要帮忙或不安全的地方。  
　　在一户出租屋里,应秋燕检查防火,记者转了一圈就要走,应秋燕突然停住说这里不行,原来这儿的煤气管道口没有用卡子卡住。看来这网格员不是谁都能干的,只有经过训练的眼睛才能从小事发现大问题。  
　　离开出租屋,应秋燕又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说要来调看监控。原来,几天前村里一户人家的2000斤铜被偷了,当时应秋燕到现场比警察还早,帮着警察维护秩序,保护现场。警察进行了初步调查以后,约好今天来村里调监控。  
　　正是跟着网格员转了这半天,记者恍如走进了当年的枫桥镇,所有的大事小情都在和风细雨、不知不觉中消化于无形。  
　　台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晏子把全科网格建设与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在了一起。他说,通过网格化基层治理,99%的矛盾问题都被消化在了村里、镇里,消化在了区里,真正体现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这正是“枫桥经验”的精神实质。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贾宝元　王春　陈磊)  
**记者手记**  
　　几天的采访下来,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坦田村与网格员一起走在村里的时候,网格员与沿途遇到的村民那种亲切自然的交流。即使什么都不说,只是打个招呼,眼里流露出来的都是对网格员的信任与亲近。  
　　那些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网格员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从一件件的小事做起,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在记者看来,台州市的网格化管理,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诠释,也正是因为网格员群众工作做得好,各种矛盾和隐患才能被消灭在萌芽中,才能真正体现大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最高境界。

**鱼山岛“连队化管理”管出和谐大工地**

**【引子】**  
　　说到舟山,人们想到最多的是舟山渔场的大黄鱼小黄鱼。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如果你仍把舟山定位在渔场,那就错了。  
 目前,舟山吸引世人目光的,既不是全球第四大渔场,也不是旅游胜地普陀山,而是一个岛。这个岛正在建绿色基地。目前在岛上的,有数以万计的工人,在争分夺秒地施工。  
 这么多人怎么管?矛盾如何排查?纠纷如何化解?舟山人信誓旦旦地说,创新大工地管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打造“枫桥经验”深化版。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记者要去的岛,叫“鱼山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  
　　4月11日早上,风和日丽。从舟山本岛乘船,向北到鱼山岛,约一个小时航程。沿途山岛竦峙,百舸争流,风光无限。  
　　船还没有靠岸,远远已能望见彩旗飘扬,人头攒动。一块竖在半山腰的巨大展板格外醒目,上书两行红色大字“连队+科技,打造鱼山安全文明岛”。  
 **连长·排长·班长**  
　　船刚靠岸,记者就被一只大手牢牢握紧拉上了岸。拉记者上岸的是岱山县公安局政治处主任黄成达,脸色黝黑的他一边擦汗一边热情地说:“欢迎记者同志!”  
　　岛,并不大。站在高处,四个方向都能望到边,但整个岛作为一个工地,那可就壮观了。极目望去,但见尘土飞扬,塔吊林立,机械轰鸣。  
　　工地上的劳动大军更为壮观。眼下是2.1万人,下个月就会到3万人,高峰时将达到五六万人。  
　　“这么多人,咋管?”记者问。  
　　“传统警务模式肯定不行!我们创造了连队化+科技化管理模式。”黄成达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身边一位个头不高、浓眉大眼、风纪扣扣得很严实的小伙子,“具体情况问他,他是2015年第一批上岛的。”

　　这位青年警官名叫郑凡潞,鱼山警务站指导员,曾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郑凡潞说:“我们就一个思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几万人的工地,如果大小问题都等百十号警务人员解决,增加三百警力也不够。”  
　　怎样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郑凡潞说,发动群众的前提是把每一位上岛的人编入一个类军事化组织,进连、进排、进班,实行类军事化管理。  
　　说话间,车开到了“大昌建设集团”驻地。院子,是板房围起来的。院内正对大门口的一扇门的门楣处,上下并排挂着两块长方形牌牌,上面紫色字写的是“排长室”,下面黑色字写的是“项目副经理”。  
　　听到喧闹声,一位穿着土黄色工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踱出了排长室。他叫胡文苗,是大昌集团爆破公司副总经理。“在公司我是经理,在连队我是排长。”胡文苗自我介绍。  
　　记者注意到,排长室的隔壁就是“连队矛盾纠纷调解室”。  
　　郑凡潞介绍,进驻鱼山岛的公司,第一件事儿就是到警务站接受“连队化”培训。中标单位负责人为连长,分包单位负责人为排长,施工队负责人为班长,各宿舍设寝室长。  
　　连队化管理的好处是层级清楚:出了问题找班长,班长不行找排长,排长不行找连长。这样能确保“小事不出连,大事不出岛”。  
　　郑凡潞讲了一个故事:2017年12月2日,警务站接到报案,某工地26吨钢筋丢失。经调阅监控录像,3小时后,警察找到“嫌疑人”。但对这批钢筋的归属双方争执不下。班长来了,搞不清。排长来了,说不清。警务站最后找来连长。48连连长施晓峰、35连连长柴伟贤到现场直接核对信息,终于弄清楚误会出在哪儿。矛盾迎刃而解。而在过去,中标单位、分包单位、施工队,都有经理副经理,工人不知道给谁干活,工人之间发生矛盾也不知找谁处理。  
　　“连排班建制,层级清晰,归属明确。不管哪一级人员出了事儿,都可以快速找到他的上级。”黄成达介绍,目前岛内226家单位2.1万人,被编成129个连、353个排、695个班。  
 **帽贴·门贴·床贴**  
　　来自四面八方的数万名工人,操着各地方言。即便每个人都被编入连排班,但如果两个陌生人在工地发生纠纷,怎么知道对方是谁?  
　　“这个容易。”胡文苗微笑着摘下工帽,工帽后面有一个“帽贴”,上面印着三行字:大昌建设集团、胡文苗、000122。原来,工地上每个工人都有这样一个帽贴,帽贴上印有统一编号。  
　　识别工人身份除了帽贴,还有“门贴”“床贴”。  
　　出了大昌集团院门左转,是职工宿舍区。在“湖底13幢”108号宿舍门口,记者看到,宿舍门上有一块半米见方的“门贴”。门贴大字标注“三连一排(大昌建设集团)”,大字下面是4个入住员工的床号、姓名和二维码。  
　　警务人员通过专用APP扫描3床陈某迁的二维码,陈的照片、姓名、身份证号、所属单位、居住地址、手机电话、就医记录、处罚记录一目了然。就连陈某迁此前曾在14幢406居住的信息也有记载。  
　　记者特别留意到,陈某迁所属连队为:3连4排1班。  
　　这些信息是工人上岛后第一时间采集的。  
　　推开108号宿舍门,里面摆有4张上下床。住人的4张床,床头均贴有黄色“床贴”,内容和大门上的一致:床号、姓名、二维码。  
　　“目前,工地上的9200多间寝室,都和这里一样,安装了统一的门贴、床贴。”黄成达介绍,警务站有19名专职流动人口协管员,每日都在核查人口信息,一周就要核查一遍。  
　　去鱼山警务站的路上,记者发现,来往穿梭的大小施工车辆,都安装了车顶标识,标注着施工单位的名称,就像城里的出租车。“统一各连队车顶标识,也是连队化管理的内容之一。这样做有利于杜绝泥头车的出现,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能够迅速锁定事主,防止肇事逃逸。”郑凡潞介绍。  
 **人防·技防·联防**  
　　在鱼山岛,记者没有看到一栋永久建筑,全是简易板房。警务站用的也是简易板房。蓝底白字的“岱山县公安局鱼山警务站”几个字,在午前的阳光下格外醒目。  
　　“不管几万人在岛上,谁来了、干什么的、何时离开的,警务站都清清楚楚。”郑凡潞边说边把记者带进“办证室”。办证室大概30平方米左右,3名警员一字排开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向门口。每人面前一台电脑,一个指纹仪。房间的另一半儿是照相处。  
　　来办证的人不多,只有两三个人,几乎不用排队。正在办证的,是一位来自河南巩义的大个子工人,和警察对话时眼神怯怯的,憨憨地笑。但他旁边的“小个子”谈笑风生,估计是这里的常客。于是,记者和他攀谈起来。  
　　“小个子”是个热心人,他来这里就是为了给刚上岛的“大个子”领路,二人并不认识。从“小个子”的帽贴上,记者一下子就掌握了他的基本信息:宁波天翼公司、周正祥、编号047450。  
　　“我就是班长,是宁波天翼在岛上的负责人。对岛上的规矩太熟悉了。”周班长语速极快,“进岛三天之内必须办证。不办证寸步难行。进来了你也出不去。”他说的“证”,是指“鱼山建设基地通行证”,外观像身份证,内存持证人的身份、单位、联系方式等信息。  
　　“如果我捡到一个,不就可以出去了吗?”  
　　“那也不行。进出岛除了通行证,还要通过指纹识别或人脸识别。”  
　　这几句话让记者想起刚登岛时,码头上的公告牌《鱼山岛入岛须知》。第一条即载明:“入岛人员须经安全培训合格后,持本人身份证办理鱼山建设基地通行证方可入岛。”  
　　郑凡潞告诉记者,严格的通行证管理让他们成功抓获8名网上追逃人员。  
　　“人员底数摸清了,局面就能有效控制。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发动连排班长参与调处就方便多了。”郑凡潞说。  
　　中午时分,在警务站门口,记者见到了中交三航公司安全员朱法鹏。朱法鹏介绍说,过去,即使在自家工地,也不可能叫出所有工人名字,也不可能知道他的上级是谁。现在好了,有了连队化管理,有了帽子上的“安全贴”,一下子就能搞清楚了。  
　　朱法鹏回忆,一次在自家工地上巡视,发现两名工人因为钢筋堆放发生争执。朱法鹏迅即打电话叫来排长(分包单位负责人),排长叫来班长,很快就平息了。朱法鹏说:“我不可能认识工地上所有工人。我只要认识排长就可以了,排长再找班长,很顺畅。”  
　　通过“连队化+科技化”管理模式,鱼山工地外来人员登记率达100%,至今未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治安案件,3500多辆车未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临行前,再次回望工地,黄成达掩饰不住内心喜悦:“超大工地军事化管理,我们在其他工地也尝试了。灵!”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万学忠　崔立伟　秦平　王春)  
**记者手记**  
　　诸暨枫桥镇,是中国陆上风光最秀丽的乡镇之一。  
　　舟山有千岛,是中国海上风光最壮美的群岛之一。  
　　早年,“枫桥经验”随着毛泽东同志的批示,向东,自大陆传到海上舟山。它所蕴含的“自治”“共治”理念,在群岛生根发芽,衍生发展“三调联动”等机制,普惠渔事海事纠纷化解,更培育出了“连队化+科技化”“渔嫂禁毒队”“物业+治安”这些群众性管理新品牌,形成了“海上枫桥经验”。  
　　“海上枫桥”的名片,是“娘舅船”和“海上老娘舅”。在海上就地调解纠纷的船被称为“娘舅船”,“娘舅船”上有威望的船老大被称为“海上老娘舅”。  
　　清明过后,记者来到舟山采访“海上老娘舅”,却被告知:现在是汛期,是捕捞的大好季节。船,都出海了……记者颇感失望。  
　　当时,记者与舟山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魏明有过一段对话:  
　　“记者同志,‘枫桥经验’的精髓是什么?”魏明问。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地化解纠纷,矛盾不上交。”记者脱口而出。  
　　“对,在舟山,能够体现这个精神的,不只老娘舅。”  
　　“还有哪儿?  
　　“你到鱼山岛看看,会有收获。”  
　　鱼山岛采访归来,记者与魏明又有一段对话。  
　　魏明:记者同志,有何感受?  
　　记者:“‘枫桥经验’的精神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现在的群众和过去不同了。过去的群众都是本乡本地的熟人。现在的群众则可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  
　　“对!”魏明深表认同。  
　　记者:“现在的矛盾和过去的矛盾不同了,纠纷也不同了。”  
　　魏明:“是啊,新时代了。群众不同了,矛盾纠纷也不同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式方法就要创新。”  
　　记者:“你提出连队化管理,就是创新。有效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实现了小事不出连,大事不出岛。是‘海上枫桥经验’!”  
　　魏明握住记者的手:“对,这就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化。”

**宁波医调会当好医患纠纷减压阀**

宁波市医调会今年10岁。  
 10年前的2月29日,她诞生在宁波江北区大庆南路,取“学名”:宁波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10年间,宁波市医调会茁壮成长:中立第三方、专家咨询机制、理赔机制、立法跟进……这些闪亮的认证,让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不断成熟,稳健地走出浙江,走向全国,宁波市医调会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宁波市医调会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成长过程中有哪些故事?4月11日,记者与宁波市医调会零距离接触。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宁波市医调会有两个家,一个是出生地,在江北区大庆南路538号,2013年,搬到了现居住地,海曙区新芝路19-6号。  
　　新家的门面并不起眼,一幢临街的五层楼房,外墙瓷砖略显斑驳,街两边绿树成荫,阳光映照出的树影,在白砖上留下别样光晕。  
　　一楼入口处挂着三块牌子,医调会的门牌就夹在“调解服务中心”与“人民调解培训中心”中间。  
　　一楼只是入户门,穿过有些狭窄的楼梯间,指示牌提示“宁波医调会,请上三楼”。到了三楼,豁然开朗,玻璃门内,就是宁波市医调会宽敞明亮的接待大厅。  
　　在采访过程中上下楼走了几趟,记者有一种新体验,“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之路,也是在曲折中见光明,在千调万解中树立了中立第三方组织的公信力”。  
 **专业人做专业事**  
　　医调会大厅,一块米黄色桌台前,摆着两张椅子,两块高悬至顶的红色电子屏,分别显示着“接待”“受理”的字样。正对门墙面上,贴着一个麦穗守护的心形人民调解标志,下方是八个大字:公平公正,明法析理。  
　　朱杉杉,一个斯文的90后小姑娘,戴着黑框眼镜,扎着马尾辫,坐在值班座位上,等候接待来访、接听电话。  
　　别看在前台接待,杉杉可是天津医科大学毕业,医事法学专业,既学法,又学医,还在医院门诊实习过。  
　　杉杉谦虚地说:“我学得浅,实践应用不够,社会阅历也缺乏,总之是有点嫩,所以在这里当文员。不像我们茅老师,他才叫一个厉害呢!”  
　　杉杉口中的茅老师,叫茅永斌,是宁波市医调会建立、发展的灵魂人物,也是医调会的专业人士,他正是记者要找的人。  
　　茅永斌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让记者颇感意外,他麦色皮肤,身材健硕,快步如飞,除了头发少一点,很难想象他已是68岁的人。  
　　听明来意后,茅永斌将记者引向他的主战场——调解室。  
　　调解室不大,摆着一张长形桌。落座,喝水,茅永斌和宁波医调会结缘的故事徐徐展开。  
　　茅永斌原是宁波市中医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懂医,自不用说,还当过医务科长,代表院方处理过不少医疗纠纷。  
　　2008年5月,让茅永斌走进医调会,除了专业的原因,用他的话说,还有一个理由是,他刚退二线,也没有“第三代”,闲着无事,想去刚诞生不到两个月的医调会看看。  
　　这一看,再难割舍；这一看,结缘十年。  
　　2012年,茅永斌获得“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称号,他出名了,他的成名作是这样一个案件:  
　　鄞州区咸祥镇西宅村村民周某,47岁,因感觉胸闷不适,去卫生院看病,心电图检查报告为“心脏Ⅲ度房室传导阻滞”,但家人下班后,发现她猝死在浴室里。  
　　接到咸祥卫生院报告后,茅永斌立即赶往卫生院。见周某家属十余人在院长办公室与院方争吵,就出示工作证亮明身份,表明公开、公平、公正的立场。  
　　茅永斌查阅了周某历次就医的病历、心电图报告单和用药情况,跟死者家属讲医学知识、法律知识,关键是用证据说话,最后死者家属明白,周某患心脏病多日,但家属无一人陪同看病,也无人知道她的病情,周某也未与家人商量,没听从医院建议及时安装心脏起搏器……  
　　最终,死者家属在后悔自责中,同意与卫生院达成调解协议。  
　　茅永斌告诉记者:“不懂医不懂法的人当医疗纠纷老娘舅,肯定不行。我们医调会有5个调解员,全懂医、懂法。虽然,真正参与调解的人不多,但我们有着一个198人的医学专家咨询库,还有一个庞大的法学专家、律师库作为支持系统。仅2017年,医调会动用专家库68人次,依托专家意见提出解决方案,最终都得到了医患双方的认可。”  
　　“都说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想想,我倒是从医院跑到医调会,帮卫生系统抱孩子来啦!”茅永斌的幽默,让在场的蒋学伟呵呵大笑。  
　　蒋学伟是医调会负责人,老家在“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他性格耿直,忍不住追本溯源:十多年前,宁波的医患关系呈现出针尖对麦芒的紧张状态,摆花圈、停尸体、砸医院、殴打医护人员,甚至陷入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怪圈。  
　　医患矛盾为何白热化?  
　　面对记者疑惑,蒋学伟分析说:“极端维权方式背后,是信息不对称造成患者对医院的天然不信任,因为医学常识掌握的少、专业术语听不懂,患者认为在行政调解中出现了医院说了算的问题,行政投诉同样是卫生局当裁判员免不了会袒护,打官司又担心耗财耗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立第三方的专业组织介入调解,就多了一条依法、公正、灵活的化解途径。”  
　　“设立医调会,充当医疗纠纷的缓冲带、减压阀,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将医院内的纠纷引入医院外,成为宁波应对社会新型矛盾的迫切需求。”蒋学伟自信地说,这就是我理解的“枫桥经验”在宁波的现学现用,更是人民调解在行业专业领域的延伸。  
 **中立公正树立公信**  
　　“这个医调会办公的房子,是卫生局帮你们找的吗?”  
　　“不是。如果那样,我们医调会肯定走不远。”  
　　宁波市司法局人民调解工作处处长金慎,武汉大学行政诉讼法学博士,清瘦的脸庞透着书卷气,回答问题干脆利落。  
　　“医调会不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必须保证机构独立、人员独立、经费独立,从而确保医调会中立第三方的地位。”金慎坦率地说,一开始,关于钱由谁出,有各种版本,有说卫生系统划拨一块,有说保险费用里提取一块,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医调会由司法行政部门指导设立,经费由各级政府财政保障,这样才能保持超脱,确保调解的公信力。  
　　蒋学伟不忘调侃地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调解员公正的立场,更是医调会树立公信力的关键。  
　　记者看到,在调解室角落的墙上,挂着一面面锦旗,每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调解故事。  
　　“谢谢你,老娘舅”。每次调解成功,茅永斌都能听到这句话,从患者及亲人嘴里本能地蹦出。  
　　胡搅蛮缠、哭哭啼啼,茅永斌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患者,他的调解策略是因人而异,释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成双方换位思考,找到利益的平衡点。　　  
　　“有不少患者认为自己没被公平公正对待,其实是医院和患者沟通的问题,所以到我这里,肯定要想办法给他解释明白,打开他的心结,避免他的情绪扩大,进一步激化矛盾。”茅永斌向记者讲述起多年前,一对舟山夫妇听了自己的话后思想大转弯的故事:  
　　68岁的老姜因甲状腺肿大,到宁波一家医院看门诊,医生检查诊断为甲状腺癌,立即要进行全切手术,但发现有粘连,肿瘤很难剥除,手术没有进行,建议他采取化疗。  
　　老姜不放心,转到杭州医院就诊,并成功做了手术。为此,他多次找到宁波这家医院索赔,医院最终答应退还医疗费。  
　　但老姜还是不满意,拉上妻子,满腹委屈地来找茅永斌,要求他主持公道,让医院给个说法。“我都按医生说的办,结果白白挨了一刀,花去医药费事小,关键是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创伤”。  
　　茅永斌了解来龙去脉后,循循善诱:“这个医生诊断是没错,治疗方案也没错,就是水平确实差了一点,又没请医生会诊,医院确实有责任,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医生人品绝对是好的,如果盲目给你开刀,可能造成更大伤害,甚至生命危险啊!”  
　　老姜夫妻突然茅塞顿开:“对啊!医疗有风险和难度,老娘舅你讲得太有道理了,我们不要钱了。”  
　　让茅永斌欣慰的是,心结打开后,这对老夫妻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医调会,从此再没有找医院维权。  
　　类似案例多得数不清,茅永斌翻出档案,粗粗统计,至少调解了200起涉及死亡纠纷,单案赔付金额最高达252万元。  
 **创新机制立法跟进**  
　　对于医闹现象,金慎有着自己的观察理解:“这是一种信访化趋势,应当遏制信访不信法问题,将百姓引向法治化轨道。”  
　　金慎认为,随着社会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的宗族家族的个人权威逐渐转向法律的权威。例如,传统的熟人社会,调解时可以说给个面子。但随着普法的深入,公民法治意识的觉醒,会质疑: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因而,依靠威权压制,和稀泥不会长久。  
　　新时代的人民调解,该怎么调?  
　　多年的研究、实践经历的结合,帮助金慎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就是要深刻理解“枫桥经验”精髓,以新方法化解新型矛盾纠纷,化矛盾纠纷于早于小,始终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坚持调解双方自愿平等的原则,坚持依法调解,规范流程、公开透明。同时又不能僵化,发挥调解的灵活便捷优势,为双方找到最大利益平衡点。  
　　医疗纠纷“宁波解法”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与医疗责任保险理赔机制共存并处,有效地发挥保险机构的服务保障作用。  
　　探索创新、立法跟进,是这一解法的发展之源。  
　　金慎为记者逐一梳理了宁波医疗纠纷立法推进的时间脉络:  
　　2008年3月,宁波市以“市长令”形式,颁布了《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首次将处置医疗纠纷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写入政府规章。  
　　2010年1月,浙江省政府颁布了《浙江省医疗纠纷与处置办法》,宁波经验被整体吸收。  
　　2012年3月1日起,《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实施,成为全国第一部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地方性法规。  
　　2013年6月21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宁波市司法局联合发文,对医疗纠纷诉调衔接中诉前、诉中对接机制进行了详细规定。  
　　“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契合法治路径。通过地方立法推动,解决了经费、部门衔接、渠道等问题,促进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规范化,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医疗秩序得到有效维护,依法解决纠纷氛围的形成,实现了多赢。”金慎评价说。  
　　天庭饱满,两额生光,和孙弘义聊起调解工作时,发现他话不多,但条理、思路异常清晰。  
　　孙弘义在法院工作了30多年,辗转民庭、行政庭、审判管理办公室等多个部门,2013年10月,经法院推荐到医调会发挥余热。  
　　“来这儿,就是为了公益事业,为了社会和谐,多做点好事。”孙弘义直言,对于法律方面的运用,尤其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四个方面,是了然于胸的,调解也肯定不会怯场,就是要补点医学知识。  
　　去年开始,孙弘义从协助茅永斌调解,变成独立调解,获得了一番成功体验,他笑着说:“调解适用的公平原则和法官裁量的原则有相通之处,都是为了促成双方心目中的正义,实现案结事了。”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万学忠秦平　王春)  
**记者手记**  
　　医疗纠纷的“宁波解法”证明,人民调解是社会治理的利刃,如何披荆斩棘,将医患纠纷化解于无形,考验着调解者的水平,更需要制度层面的前瞻谋划、顶层设计和法治推动。  
　　宁波市医调会,一个中立公正的第三方组织,由司法局牵头指导,成立后,一批热心公益的调解员勇于挑担,敢于担当,主动抱起卫生行政部门的“孩子”,而且通过党委政府的支持,将纠纷导入了依法调解的轨道。  
　　眼下,宁波因医疗纠纷而向政府部门投诉、信访的案件实现了零发生,医疗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大幅度减少,通过医疗技术鉴定、尸检或诉讼途径依法解决医疗纠纷的案例逐年增多。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引入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宁波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10年来,宁波市两级医调会共成功调解医疗纠纷5455起,成功率达93.38%。  
　　关键是:没有一起反悔。

**上城“亲民尚和图”成守护平安家园宝图**

**【引子】**  
　　桥上车水马龙,岸边商铺鳞次栉比……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将宋代都市的繁华景象生动地展现于人们眼前。  
 如今,在南宋皇城所在地,杭州市上城区的繁华程度丝毫不逊于《清明上河图》。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居住着近50万居民,每年接待游客量超过3000万人次。  
 人多事多,如何传承“枫桥经验”精髓,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上城公安分局局长秦文提出要“画”一张“亲民尚和图”,画的立意是:亲近群众、集聚民智、崇德尚法、和谐与共。  
 靠着“亲民尚和图”,上城区近年来警情和发案数连年下降,连续第13年被评为浙江省“平安区”,群众满意度、幸福感、获得感水涨船高。  
 4月17日记者来到上城区,仔细观看“亲民尚和图”的每个细节。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杭州市区有一条至今仍保持着历史风貌的老街——上城区清河坊。这里是外地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短短400米长的街区汇聚了胡庆余堂、方回春堂等众多历史建筑及百年老店。  
　　4月17日一早,记者来到清河坊老街,找到了一位最熟悉街区情况的“导游”——社区民警吕勤。  
 **“御街联盟” 警民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吕勤20岁出头,说起话来文质彬彬,显得很干练。别看他年纪不大,却是清河坊商户们的“老朋友”,460个商户都认识他。  
　　见到记者,吕勤直截了当地介绍说:“清河坊平均每天游客量在3万左右,高峰期达到12万。说了你可能不信,这么大的人流量,去年仅发生了14起扒窃案件。放在几年前,类似案件一天就有十几起。”  
　　吕勤说完,便带着记者开始例行巡查走访。  
　　大老远看到吕勤,朱炳仁铜雕艺术博物馆经理孙伟迎了上来,他是“御街联盟”的一名网格长。孙伟热情地介绍说:“顾客在店里丢了东西,往往会产生不必要的纠纷,这是我们最头疼的。自从成立了‘御街联盟’,这样的麻烦事几乎没有了,游客更安全,营商环境也更好了。”  
　　孙伟所说的“御街联盟”,是去年8月成立的,街区的460铺商户都是联盟的成员,他们被划分为12个网格。除了公安专业力量和辅警外,保安、医疗卫生等民间志愿者力量也纳入其中,群策群力、形成合力,构建群防群治大格局。  
　　“‘御街联盟’就是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大家看好自己门,管好自己人,安全防范意识强了,我们的工作也轻松了许多。”吕勤说。  
　　在一家丝绸店前,吕勤停下脚步,冲着店主打起招呼:“程老板,今天生意不错吧,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帮我们抓到了小偷。”  
　　吕勤告诉记者:“‘御街联盟’建了个微信群,这个小小微信群有时能发挥大作用。前不久这家丝绸店店主发现一名小偷,将照片传到了微信群里,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也帮助我们第一时间锁定了嫌疑人。”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除了“御街联盟”外,上城区还发起建立许多民间社团、公益组织,有外卖小哥组成的“岳王骑”、小区物业组织的“紫阳管家”、南星“鹰眼联盟”、湖滨“千眼卫士”等,他们都是默默守护平安家园的幕后英雄。  
　　吕勤的记录是:2017年以来,平安志愿者为公安机关提供有价值信息1.8万余条,协助抓获嫌疑人500多名,协助查获违禁物品4000多件。  
　　这一串数字的背后,是从“人人自防”到“携手他防”点滴跬步的积累,更蕴含着全民助力平安建设的蓬勃力量。  
 **“邻里110” 矛盾不上交责任不下推**  
　　“最多的时候我一天接到过300多个电话,手机经常打到没电。”余刚个头不高,黑黑瘦瘦,但能量很大,同事们都叫他“小金刚”。  
　　从部队转业后,余刚成为一名社区民警,渐渐地他和小区群众处成了亲人。  
　　在上城区紫阳街道凤凰社区,群众遇到大事小情会第一时间想到余刚,久而久之他的手机号码也成了社区“邻里110”。  
　　“大家给你打电话都反映啥情况?”  
　　余刚笑了:“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多数还是家庭邻里纠纷。”  
　　看到记者对“邻里110”感兴趣,余刚建议去上城公安分局望江派出所找“老娘舅”俞关祥聊聊,据说矛盾纠纷到了他那儿,都能化解。  
　　匆匆赶到上城公安分局望江派出所调解室,已接近晚上8点,俞关祥刚调解完一起家庭纠纷准备下班,可说起调解工作他顿时又打起了精神。  
　　年近花甲的俞关祥,退休前是一名老师,也是位“草根调解明星”,一开口就能听出浓浓的杭州味道。  
　　“调解工作其实挺辛苦的,要受得了委屈、压得住火气、理得清原委、讲得清法理、管得住小节。”俞关祥说出化解矛盾的秘诀。  
　　“有没有特别棘手的纠纷?”记者问。  
　　“棘手的纠纷有,但不一定难化解。”俞关祥十分自信。他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2018年2月19日,望江派出所接到报警,说某浴场员工祝某某在上城区鸥江公寓一出租房内死亡。刑侦部门调查访问,现场勘验,初步尸检,排除刑事案件,死因为休假期间酗酒导致死亡。  
　　事件发生后,死者家属十多人找用人单位讨要说法,要求赔偿,双方产生纠纷。社区民警调解无果,找到老俞。  
　　一开始俞关祥没有进行调解,只是静静听着事情的原委,等死者家属发泄差不多了,他开口道:“失去家人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孩子是在休假期间酗酒导致死亡,换作你是用人单位,这钱你赔吗?”  
　　简单的换位思考,有时胜过一堆道理。老俞用自己的方式化解了纠纷,死者家属与公司最终达成了补偿协议,双方还特意送来锦旗以示感谢。  
 **“公民警校” 探索社会治理新格局**  
　　今年1月,上城区工商银行柳翠支行大堂经理傅洪破了件“大案”。  
　　那是1月3日上午,上城区吴山广场附近,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拎着黑色塑料袋,在ATM机前四处张望。  
　　“当我走上前询问时,大姐支支吾吾,欲言又止。这时,她的手机响了,从电话里的只言片语中我听到了‘账户冻结’‘医保诈骗’等词,我立即警觉起来,详细追问,终于弄清事情原委。”  
　　原来,大姐接到一个来自天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公安局,查到她涉嫌医保诈骗,要对她的医保账户进行冻结,为证明清白,需要将所有资金转入一个调查账户。  
　　傅洪确信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为彻底打消客户的疑虑,她立即向辖区派出所报警。最终,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惊慌失措的大姐醒悟,连连道谢。  
　　一年多时间,傅洪成功阻止了5起电信诈骗案件,其中最大的一笔高达400多万元。  
　　傅洪对电信诈骗的敏感源于她的另一个身份——“公民警校”学员。  
　　“参加过几次‘公民警校’的培训后确实不一样,如今最新的电信诈骗案例、常见的电信诈骗类型,我听到关键词就能识别。”傅洪对记者说。  
　　“公民警校”是上城公安分局2016年3月创立的。严格地说,它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校,是针对当前突出的案件类型,对群众开展专业培训,目的是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参与群防群治。  
　　听说记者要来“公民警校”看看,教导主任陈全江很高兴,早早出来迎接。他是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曾经把自己的头像和电话印在挂历上送给辖区群众,还上过新闻联播。  
　　“现在‘公民警校’有8万多名学员,他们来自社会各界。而专业培训不仅提升了学员的安全防范意识,更增强了学员对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识别能力。”陈全江告诉记者,比如,我们针对电信诈骗案件高发的情况,对学员进行多场培训。两年的时间,学员们主动发现并成功阻止100多起电信诈骗案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  
　　上城区的“亲民尚和图”可观赏的细节还有很多,无论是哪个细节,都体现着“枫桥经验”的精髓,展示着上城区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精神。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刘子阳　王春)  
**记者手记**  
　　在采访过程中,“公民警校”引起记者浓厚兴趣。  
　　“公民警校”是一所面向全体公民的没有围墙的学校。  
　　在上城公安分局局长兼“公民警校”校长秦文看来,社会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已不能单靠“打、管、控、压”方式和手段。“公民警校”能够将不同层面、不同职业的社会成员又快又好组织起来,聚民心、集民智、汇民力,真正把“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将“局外人”变成“合作伙伴”,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无论是“公民警校”“御街联盟”还是“邻里110”,“枫桥经验”的表现形式在变,但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核心要义始终不变,这或许就是“枫桥经验”55年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温州一体两翼解矛盾纠纷于无形**

温州,简称“瓯”。瓯柑是当地一种水果,味道甜中泛苦。  
　 正如瓯柑,浙江省温州市在收获经济飞速发展成果的同时,各类矛盾风险交织叠加,社会治理也面临着新压力。如何继承发扬“枫桥经验”精神创新社会治理,及时发现、有效应对风险,预防和化解矛盾,是摆在温州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重——起自端,大——来自源。温州人的解题思路是:抓住基层治理最前沿和风险防控的首尾两端。以平安建设为主体、社会风险多元防范化解和基层应急处置规范为两翼,全面探索“一体两翼”基层治理“温州模式”,有效提升社会治理、风险防控能力。  
　　4月20日,记者走进温州,体验“瓯柑”的苦与甜。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睡觉时把手机放在枕头边,神经时刻都是紧绷的。”何善杰是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他最怕两件事——半夜手机响和消防车警笛声。  
　　梧田街道是瓯海区的重镇,城中村遍布,危旧房、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隐患突出,而管理力量却比较“单薄”,这让街道干部们感到“压力山大”。  
　　“自从街道有了260人的全科网格队伍,睡觉踏实多了,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何善杰如释重负地说。  
 **全科网格 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梧田街道流动人口超过10万人,出租房9000多户,我这么说你可能没有概念,咱们去村里看看,到那儿你就明白了。”何善杰说着,快步走出大门。  
　　说话间,来到了梧田街村。一进街道,就看到全科网格员的公示牌,公示牌上,专职网格员苏俊的名字、照片、手机号码十分醒目。  
　　这时,一位身穿红马甲的年轻人朝我们走来,何善杰告诉记者,他就是苏俊。

　　“照片上是你吗?怎么不太像?”记者问。  
　　苏俊笑着挠挠头:“可能是走访晒黑了,照片比本人好看。你跟着我走访吧,这里是典型的城中村,没人带着很容易迷路。”　  
　　一部平安通手机、一本网格工作纪实本、一本工作排查手册、一张排查整改通知书、一个工作牌、一件红马甲,这六件套是苏俊日常工作必备“家当”。  
　　“你们北京有‘朝阳群众’,我们梧田有‘专职网格员’。现在,网格长、专职网格员、网格指导员、兼职网格员是每个网格的标配。”苏俊说。作为专职网格员,他除了每周半天学习交流外,剩余的时间都在网格里走访。  
　　挨家挨户上门核查人口信息、巡查各类安全隐患、宣传消防知识、开展治安巡逻是苏俊每天都要干的事。  
　　“比如这家的煤气灶放在阳台,这是不允许的,这种情况我就会提醒他整改。”苏俊指着一栋小楼的二楼阳台说。  
　　这么多房屋怎么查?人家听你的吗?  
　　“有严格标准,规定非常详细。遇上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会找网格长,网格长是村主任兼任的,人头熟、有威望。如果还解决不了我们会将信息上报,交给有关部门处理。”苏俊介绍说。  
　　前不久,苏俊立了一大功。那天,他在网格内巡查时,发现一辆存储可燃气瓶的厢式货车和一辆配送燃气罐的电瓶车,样子十分可疑,他立即联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现场清查。最终查明,车上100多桶燃气罐是隐患重重的“黑煤气”。  
　　一圈走下来,记者气喘吁吁,可苏俊却气定神闲。他告诉记者:“我每天要走近两万步,这一圈不算什么!”  
　　像苏俊这样的专职网格员在温州有9979名,他们像移动探头一样,时刻注视着每个角落,为温州的平安默默守候。  
 **平台流转 隐患纠纷件件有回复**  
　　为理清全科网格的流转过程,记者来到了乐清市后桥村,遇到了陈瑶。  
　　陈瑶,一头马尾辫、纤瘦的身材、青春洋溢的笑容,如果不是胸前挂着工作牌,记者很难将她与专职网格员联系起来。  
　　这位刚毕业的90后大学生,是乐清市招聘的1632名专职网格员中的一员。  
　　走进后桥村信息指挥室,一张特殊的平安网格地图呈现在面前。这是陈瑶和同事们花了1个多月时间,对自己所在网格的房屋及实有人口进行大走访、大排查后绘制出来的。  
　　图上汇集了网格基本情况、重点场所管理、应急避灾疏散、外来人口等多项信息,让人一目了然。  
　　“有这张图工作起来方便多了,按图索骥让我们入格走访的思路清晰,一有新动态就知道该干什么、怎么干。”陈瑶说。  
　　入格走访是陈瑶发现、解决村内大小事的基础。在刚刚结束的走访中,陈瑶发现村内电线杆上的电线掉落,挂在道路中间,存在着安全隐患。她立刻用手机拍照,并通过“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把信息上报到翁垟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  
　　这条信息迅速流转到综合执法平台,没多久供电所就安排工作人员前来维修。事件处理完毕,信息第一时间流转回陈瑶手中的手机平台上,她现场核实确认问题得到解决后,通过手机进行了信息反馈。  
　　在乐清,网格员只需录入一次数据,各条线系统就能在数据共享平台上获取,这是乐清专职网格员依托“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App采集信息,实现事件及时高效处理的一个缩影。  
　　此外,手机上会实时推送50项全科网格工作任务清单和三类人员走访规定,让网格员工作更加高效便捷。  
　　不想走访,能偷懒吗?  
　　“耍小聪明,想都别想!网格工作有监管,只要携带‘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的手机,乡镇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就可以在系统里清晰地看到网格员的工作轨迹、工作时长及工作绩效等数据。”陈瑶笑着说。  
　　“网格员信息采集上报——综治中心分流交办——四个平台各职能站所执行处置——网格员核实反馈”,整个流程实现了闭环无缝对接。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在温州正成为现实。  
 **联动处置 抓住维稳工作末梢神经**  
　　以全科网格为基础,依靠丰富的调解手段,温州95.17%的社会矛盾纠纷在乡镇以下得以化解。然而,在复杂的社情环境中,仍有极少数问题难以在前端消灭,当“防火”之翼失守之时,另一只“灭火”之翼正在严阵以待。  
　　“初旭”公司号称全国第一的鸭舌制造商,公司老板曾经跑路失联,消息传来,百余名被拖欠工资的员工,集聚一起准备上街游行施压。  
　　蒲州街道涉稳信息库收到这条信息后,及时分析研判,并立即启动劳资纠纷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15分钟内,公安、特勤、人社、平安志愿者等处置、疏导力量全部到位……  
　　这是2015年11月23日发生的一幕。  
　　经多方努力,记者找到了全程参与事件应急处置的两名当事人,网格员金垲迪、人民调解员方清心。他们还原了当时的情形:  
　　金垲迪几乎是第一时间发现“初旭”公司门口有人员聚集,在弄清事情的基本情况后,他将信息上报。  
　　“在别有用心者的煽动下,员工出现游行和打砸苗头,街道综合应急人员迅速赶来,控制住局面,及时搭建沟通化解平台,缓和员工情绪,防止了事态升级扩大。”金垲迪回忆说。  
　　75岁高龄的方清心早已退休,接到司法所通知后,他立刻赶赴现场,开始疏导化解工作。  
　　“俗话说‘烂船也有三分钉’,何况这么大个厂!工人工资在法律上是优先受偿的,放心,钱一分也不会少。”方清十分镇定,开始给带头人员做工作。  
　　通过联动处置,实现了欠薪问题的彻底化解,有序引导企业复产、保住了温州鸭舌的知名品牌。如今,企业的产品销量持续提升。  
　　这起“教科书式”的案例背后,“一三五”应急处置规范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一个总体预案；信息整合研判、力量整合调度、后续化解稳控三项机制；不少于五类突发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  
　　蒲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王颖说:“以前出了事情,自己凭着经验来处置,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一三五’建立以后,指挥起来顺畅,处置有了底气,事情苗头很快得到了遏制。”  
　　温州,抓住维稳的神经末梢,赋予街道突发事件先期处置的“尚方宝剑”,确保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刘子阳　王春)  
　　**记者手记**  
　　在浙江温州采访,记者接触到4名网格员,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其中黄柠檬给记者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小姑娘个子不高,法学本科毕业,是梧田街道的一名干部,刚到街道时做了两年多的网格员,她告诉记者,本来自己不怎么爱说话,自从当了网格员,性格外向多了。  
　　“我们不是找事的、挑刺的,可是处理问题时,常常有人凑热闹讲几句泼冷水的话,搞得工作没法开展。”为这些事,黄柠檬还抹过几次眼泪。  
　　黄柠檬想让更多人了解网格员、理解网格员,告诉大家网格员其实不容易。  
　　“随着时代发展,网格员的职能也从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经过努力,很多人开始主动联系我,越来越多的人和我成了朋友,在村里碰见,会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有时还拉着去家里坐坐喝杯茶水。”黄柠檬说,这让她感觉很欣慰。  
　　温州的网格员可以是领导干部、社区负责人,也可以是一般工作人员、教师、医生等等。无论是谁,也无论是管理还是服务,他们都牢牢地信守一点,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区百姓。这一做法诠释了“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一切为了群众、始终依靠群众。这正是“枫桥经验”的精髓。

|  |
| --- |
| 以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浙江司法行政新发展 |
| 访浙江省司法厅厅长马柏伟 |

马柏伟很忙。  
　　这位浙江省司法厅厅长,4月19日上午刚刚在省人大参加了宪法及人大制度基本理论讲座,下午,又要从杭州赶赴二百公里之外的衢州,在那里主持召开监所安全稳定工作座谈会,所以,记者只能见缝插针,利用他吃午饭的时间进行采访。  
　　马柏伟说,“枫桥经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源时,是成功改造教育“四类分子”的经验；在改革开放时期,是就地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叫“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的新探索。  
　　从司法行政角度概括,可以说,“‘枫桥经验’发轫于社区矫正,发展于人民调解,深化于法律服务,与司法行政工作密不可分”。  
　　马柏伟说,司法行政部门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是践行和创新“枫桥经验”的重要职能部门,是坚持、发展、创新“枫桥经验”的生力军,必须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导,高水平推进浙江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 加快建成高水平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谈起“枫桥经验”,马柏伟滔滔不绝。  
　　马柏伟说,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美好生活需要更加广泛,对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新要求。  
　　“枫桥经验”的要义是为了群众、依靠群众,适应新时代矛盾新变化,司法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加快建设高水平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精准、高效的法律服务,让人民有更大获得感、更多幸福感、更高安全感。  
　　具体来说,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实体平台、网络平台、热线平台三位一体推进。  
　　公共法律服务平台是集成司法行政法律服务项目、提供公共法律服务产品的有效载体。目前,浙江全省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已实现全覆盖。在此基础上,要加快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建设,改造提升“12348浙江法网”,建成人工智能公共法律服务咨询系统,加强村、社区“e服务微信群”建设,让人民群众获得法律资讯不出村、社区,解决法律问题不出乡,找法律服务像网购一样便捷。努力实现省域内呼叫接入全覆盖、服务无死角、群众零等待。  
　　二是促进城乡均衡、地区均衡、人群均衡三位一体发展。  
　　浙江省法律服务业相对较发达,但城乡不均衡、地区不均衡和人群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就是要认真实施《浙江省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化标准(2017—2020年)》,注重发挥农村法律顾问作用,加强法律援助供给配置标准化建设,使力量向基层下沉、资金向基层投放、政策向基层倾斜,不断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水平。

　　三是加强服务产品、服务标准、服务队伍三位一体建设。  
　　目前,浙江省正在形成惠企便民服务二十条、企业法律服务八法,开展打造最佳营商环境法律服务七大专项行动,发布7大类44项公共法律服务产品指导目录,通过一套固定的操作规范和流程,努力将无形的法律服务直观地呈现在服务对象面前,使法律服务看得见、摸得着、可评价。  
　　同时,还要加强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建设和队伍建设,努力推动管理模式从“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服务方式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服务内容从“碎片化”向“整体性”转变。  
 **以善治为目标 推动完善“三治融合”社会治理体系**  
　　马柏伟健谈也善谈,三言两语便将问题点明说透。  
　　马柏伟介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发源于浙江桐乡,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肯定了这项来自浙江基层的新创举,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新内容,浙江省委政法委把其列入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六大工程范畴,指定由省司法厅牵头组织实施。  
　　接到这一任务后,浙江省司法厅马不停蹄研究制订出具体实施方案,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具体来说,分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帮助修订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夯实基层自治基础。  
　　村规民约社区公约是国家法律法规在基层的具体体现和末端延伸,是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基础。近年来,浙江省把村(社区)法律顾问、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助理员等资源整合起来,发挥法律专业优势,在制订修订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过程中严把法律关,使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不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  
　　二是全面加强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夯实基层法治基础。  
　　具体举措是,建设公共法律服务窗口、自助法律服务终端机、法治宣传阵地、人民调解委员会、社区矫正工作站、法律服务微信群,修订村规民约,培养法律顾问、法治带头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户。  
　　目前,全省已建成县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26894个,其中国家级109个、省级1196个。  
　　三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基层德治基础。  
　　推行“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支撑法治文化,把社会和谐稳定建立在较高的道德水准上。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在广大家庭落地生根。  
 **以预防为基点 健全风险预测预警预防新体系**  
　　马柏伟职业经历丰富,在担任省司法厅厅长之前,马柏伟是省供销社主任。外出开会,对方一听这来历,往往投之以狐疑的目光,马柏伟说,每逢此时,他只能报以微笑。  
　　其实,马柏伟是正经“法律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律专业毕业后不久,便在家乡浙江磐安被提拔担任县司法局副局长,通过了司法资格考试,而后,任磐安法院院长、永康法院院长、金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在政法战线,他滚打摸爬多年,说起来,也是个“老政法”了。  
　　这位“老政法”担任省司法厅厅长后,一上手,就狠抓谁执法谁普法责任落实、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人民调解和监所安全,并在预测预警预防社会矛盾方面未雨绸缪、屡见成效。  
　　上任两年多来,马柏伟和他的同事们不负众望,在G20杭州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党的十九大等重大安保活动期间,实现了监管场所“零事故”、特殊人群“零失控”、矛盾化解“零死角”,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马柏伟说,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对社会风险进行有效预测预警预防非常重要,浙江省在这方面重点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维护监管场所安全稳定。  
　　推进“平安监狱”“法治监狱”“智慧监狱”三位一体建设,通过机制创新、信息研判、大数据分析,推动监狱安全稳定工作由过去的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  
　　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推行服刑人员离监探亲和戒毒人员奖励性外出探视新机制。落实治本安全观,以改造人为宗旨,创新开展罪犯(戒毒人员)“修心教育”,将以往安全稳定的工作目标转变为当前的工作起点,变“生命线”为“起跑线”,努力把罪犯(戒毒人员)改造成人格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从本质上消除影响监所安全稳定的问题。  
　　目前,浙江实现了连续6年10个月监狱安全“四无”目标、连续12年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无脱逃。  
　　第二件事:对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实行有效管控。  
　　全面推进社区矫正标准化建设,组织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做到了情况明、管得住、能救济、保平安。推行刑满释放人员信息核查和衔接制度,创新安置帮教方式方法,有效提升安置帮教工作水平。  
　　第三件事:把人民调解工作做实做新。  
　　不断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向医疗事故、道路交通、网络交易、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矛盾纠纷多发、易发的行业和领域延伸,目前,全省已建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1235个,涉及15个行业或领域,基本实现了重点行业、领域全覆盖。  
　　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建设,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健全人民调解专家库目录,不断提升人民调解专业化水平。  
　　建立社会矛盾纠纷预测预警预防指标体系,全面推广大数据+人民调解的“温州新模式”,利用大数据技术、信息化手段,科学研判热点难点问题和矛盾纠纷隐患,努力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  
　　推行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和定期分析报告机制,及时发现和化解一大批矛盾纠纷,第一时间上报苗头性、倾向性不安定因素和预防处置意见,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结束访谈时,我们握手告别,马柏伟微笑着,淡定而自信。

|  |
| --- |
|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公安理应一马当先 |
| 访浙江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双全 |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王双全是《法制日报》的老朋友,见到他,格外亲切。  
　　在出任浙江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之前,王双全先后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任职,《法制日报》曾得到他诸多支持。  
　　在省公安厅院子里,王双全与采访组成员一一握手:“早知道你们来浙江采访了,你们的报道贴近百姓,贴近基层,我全都看了。欢迎大家!”  
　　一起乘电梯上楼,在厅长办公室坐定,王双全从包里掏出个笔记本,说,按你们的采访要求,我昨晚拟了个提纲,从公安角度谈谈如何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王双全说,浙江公安与“枫桥经验”有着不解之缘,因为这个经验最早就是公安系统蹲点调查、提炼总结的。坚持、发展、创新“枫桥经验”,浙江公安机关理应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一马当先。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王双全温文尔雅,他轻言细语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起“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一开始是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活动。  
　　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在社教试点中,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骂人,没有打人,还允许申辩,结果没有逮捕一个人,就把全区67个原先认为非捕不可的“四类分子”全部说服了,这在当时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极“左”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公安部调查组总结上报后,毛泽东同志十分高兴地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指示好好总结,“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走向全国。  
　　王双全介绍,“枫桥经验”源自公安,来自基层,是全国政法综治战线一面旗帜,也是浙江一张“金名片”。  
　　值此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之际,浙江公安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一大重要任务就是全面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全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  
　　要夯实基层基础,人往基层走,力往基层使,钱往基层投,让公安派出所回归服务群众、基础管理、矛盾化解等本职工作上来。  
　　要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和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齐心协力,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要上门服务,优化服务,精准服务,把群众的需求解决在家门口。要适应互联网时代新趋势,学会“与网共舞”,努力做到民意网上来,民忧网上解,民怨网上化,民智网上出,夯实社会治理民心基础。  
　　要关口前移,争取全社会多方力量参与,积极探索矛盾多元化解新机制,努力做到哪里产生矛盾,就在哪里化解矛盾,真正把风险隐患发现在基层,化解在起始,稳控在当地,有效化解矛盾防控风险。  
 **管理变服务让群众满意**  
　　采访中,王双全问,什么是幸福感?  
　　不等记者开口,他自答道,过去就是有饭吃,有衣穿。我小时候,有肉吃就是件很幸福的事。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产生了许多新需求,在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公安机关、政法机关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一个非常重要的落脚点就是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努力转换理念,转换职能,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新需求,增强其幸福感。  
　　王双全说,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浙江省委、省政府近年来全力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简化手续,办事提速,变管理为服务,深受人民群众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充分肯定,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人代会报告中也力推浙江此项改革,并在前面加了五个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去年底,浙江省对“最多跑一次”改革进行民意调查,群众满意度最高的前四项,公安占了三项,一项是出入境管理改革,再一项是户籍管理改革,还有一项是交通管理改革。原先都是“老大难”问题,现在都已有很大改观。  
　　王双全说,记得今年1月,我刚到浙江参加省人代会时,我们小组一位浙江大学教授在发言中讲,他去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办出境手续,本来准备了半天时间,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好了,他的获得感就很强。  
　　听到这里,记者也颇有感慨,忍不住插话说,这一路采访过来,无论是杭州的户籍管理改革、温州的物联网建设,还是台州的交通乱象整治、舟山的科技控岛创新,浙江公安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给记者一行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双全颔首称是,接着介绍说,再一个就是户籍管理改革,过去办户口迁移,领迁移证、准迁证,要来回跑,还要排队等候大半天。但现在,在我们浙江省内迁移户口,不用去办准迁证,你到迁入地,把身份证递过去,民警网上一查,马上就能办。如此高效率,群众前来办事自然就有了获得感、幸福感。  
　　“现在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电信诈骗,我上午刚从上城区公安分局调研回来。”王双全说,昨天还主持召开了全省打击电信通讯网络新型犯罪联席会议。现在的电信诈骗,防不胜防,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重要犯罪,如果一个家庭上当受骗,钱一下子被骗光了,相当于遭受灭顶之灾,还有什么幸福感获得感?  
　　这些年,浙江省公安一方面加大打击力度,一方面创新了许多预防诈骗的新方法、新手段。比如上城公安分局搞了一个公民警校,对群众开展防诈骗反诈骗宣传教育,形式新颖,很有针对性,很受欢迎,效果很好,2016年,上城区电信诈骗发案数同比下降了48%,去年,又下降了18%。  
 **“三治融合”法治是关键**  
　　王双全今年1月出任浙江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对浙江的有关情况已了如指掌。  
　　他说,这些年,我们浙江桐乡等地群众创造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也是“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受到中央领导肯定,被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  
　　我认为,“三治融合”,法治是关键,应该把法治放在中心地位。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清官情结,老百姓希望当官的都是包公,能无畏无惧为他们主持公道,所以一些人信访不信法,遇到什么事情往往喜欢往上面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决策。“三治融合”,首先就是要把法治大旗竖起来。从老百姓角度说,要增强法治观念,养成依靠法律解决矛盾纠纷的新习惯。从政府角度说,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我们公安民警,都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带头依法行政、依法执法,努力提高依法办事本领,以法治引领“三治融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公安要重打击也重防范**  
　　“对公安机关来说,应该如何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面对记者的提问,王双全道出自己的观点:  
　　公安机关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治安乱点整治好,保持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对于那些影响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罪,如“两抢一盗”、电信诈骗等,对那些群众深恶痛绝的“黄赌毒”问题,公安机关必须随时出手打击,保持常态化打击态势。  
　　在治安形势连续多年向好的基础上,借助“云上公安”等现代化信息新技术,去年,浙江省刑事治安警情又持续下降。  
　　王双全举例说,去年,仅命案侦破一项,浙江就创造了三个历史之最:破案率最高,当年发生的348起命案百分之百破案；发案数最低,命案发案同比下降20%,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破积案最多,一年破获了88起陈年命案积案,也创历史新高。省公安厅刑警总队长俞流江还因此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法治人物”。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公安机关的另一项重要职能是防范社会风险,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你们在枫桥采访估计也已看到,那里的红枫义警、老杨调解室都是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好载体、好平台。很多人认为调解是司法所的事情,其实,一个聪明的派出所长更应重视调解。因为刚萌发的矛盾得到了调解,就不会变成治安案件、刑事案件,这对减轻派出所出警负担是大有好处的。  
 **提高做群众工作本领**  
　　说到“枫桥经验”的内涵是依靠人民群众,就地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问题,王双全坦诚地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依靠人民群众,首先要与群众打成一片,拜群众为师,真正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  
　　你看毛主席当年批示推广“枫桥经验”是怎么做的,派工作组到枫桥蹲点,一蹲就是几个月。只有这样,写出来的调查报告才有分量,总结提炼出来的“枫桥经验”才经受得住历史考验；你看毛主席当年又是怎么与干部、群众谈话的,晚上往炕上一坐,烟一抽,就开始谈。  
　　而现在,有多少人在一个地方调研一蹲就是一个月的?没有。包括我在内,到一个地方待半天就很不错了。  
　　所以,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反对形式主义,转变工作作风,切实提高公安机关做群众工作的本领。  
　　在这方面,我们已开始新尝试,迈出新步子。去年8月,我们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联合组成调研组,由我们公安厅金伯中副厅长带队,在枫桥镇蹲点三个多月,边调研总结,边推动完善,提炼了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主要内涵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为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王双全介绍说,遵照中央、省委和公安部部署,浙江省公安厅年初就制定了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实施方案,确定了八大工作载体,即深入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行动,积极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深化开展系列平安创建活动,全面实施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提升工程,全力打造平安共同体,持续推进公安“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提升智能防控水平,加快创建“枫桥式”基层所队。  
　　王双全是“老政法”,也是“老西藏”,1983年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进藏,先后在西藏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区委政法委工作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在家乡四川生活了20年,在西藏反而生活了32年”“没料到年过半百,会到浙江工作”。  
　　提到来浙江任职,王双全感慨地说,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和革命“红船”启航地,有机会到浙江任职,我备感荣幸和自豪,又深感责任重大。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王春　刘子阳)

|  |
| --- |
| 以排头兵姿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
| 访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 |

**□　本报赴浙江采访组**  
　　4月18日下午,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昌荣在省委大楼一间小会议室里接受了《法制日报》记者采访。  
　　听了采访组关于“枫桥经验”报道的整体介绍之后,王昌荣对《法制日报》新时代“枫桥经验”新亮点系列采访活动给予充分肯定。  
　　王昌荣说,我认为采访组深入基层、作风扎实,系列报道生动形象接地气,已产生重大社会影响。这次采访活动是《法制日报》践行新闻工作者“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导向的具体体现,是对浙江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的鼓励支持,我代表省委政法委表示感谢。  
　　“枫桥经验”是浙江的传家宝、金名片,也是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  
　　王昌荣告诉记者,下半年,中央政法委将联合浙江省委隆重召开纪念大会,这是浙江省的大事,也是全国政法战线的大事。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载体,做好总结提升推广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提起新时代“枫桥经验”,与记者一行隔桌而坐的王昌荣侃侃而谈:  
　　从这些年浙江的实践来看,新时代“枫桥经验”涵盖了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枫桥经验”都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和鲜活样本,已经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基层治理的成功经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浙江“两个高水平”建设的进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会多起来、不会少下去。同时,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了“高水平建设平安浙江、打造平安中国示范区”的目标任务。做好浙江新时代政法工作要求更高、任务更重,迫切需要更好地运用“枫桥经验”基本精神,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化解矛盾、防范风险、服务群众中的独特优势,发挥其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为整体提升平安浙江建设水平打好基础。  
　　记者请王昌荣就进一步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介绍相关情况。  
　　王昌荣说,总结好、提升好、推广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浙江全省上下义不容辞的重大政治责任。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车俊书记、袁家军省长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省委常委会还将此项工作列入《2018年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车俊书记强调,要以筹备“枫桥经验”纪念大会为契机,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彰显新的优势,推动解决制约平安浙江建设的突出问题,努力提高全省平安建设整体能力水平。省里专门成立了由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担任组长的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工作专班,出台了工作方案,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初心不改是“枫桥经验”的灵魂所在,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从群众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的地方入手**  
　　记者一行在浙江采访半月,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枫桥经验”的灵魂究竟是什么?  
　　迎着我们探询的目光,王昌荣笑答,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一路走来,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都是其精神内核和核心要义,也是其不断创新发展的基本点。  
　　55年来,尽管浙江经济社会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枫桥经验”的为民初心始终没有改变,这也正是“枫桥经验”永不褪色、永葆生机的精髓和关键所在。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和核心要义,也是新时代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本质要求。  
　　我理解,以人民为中心是具体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指明了方向。  
　　我觉得,作为从事政法工作的同志,就是要按照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经常想一想群众最盼望什么?最关心什么?最怨恨什么?经常问一问群众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的方面有哪些?从而以此为导向,来改进各项工作。  
　　停顿了一下,王昌荣接着说,我认为,当前群众最盼望的就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最关心的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最怨恨的就是黄赌毒黑拐骗等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公共领域安全问题。对此,浙江提出要以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民意导向,按照“群众想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的要求,充分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神实质,着力解决好群众最盼最急最怨的突出问题,善于在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中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在真心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中赢得群众的信任,在维护群众权益中获得群众的支持,切实打牢社会治理的民心基础。  
**与时俱进是“枫桥经验”的鲜明特征,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半个多世纪来,“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原因何在?也是记者一行思考的问题。  
　　王昌荣的一番话破解了这一问题。  
　　他说,55年来,“枫桥经验”之所以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就是因为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不变”的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一核心灵魂。“变”的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主动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讲,“枫桥经验”55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顺应形势任务需要,创造性解决不同时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过程。  
　　起初,“枫桥经验”是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上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和帮教失足青少年的成功经验；十年动乱结束后,枫桥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为全国拨乱反正提供了范例；改革开放后,枫桥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  
　　2003年习近平同志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2004年5月,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决策部署。全省各地按照省委部署,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新经验。  
　　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同志在诸暨调研座谈时说:“过去有很多典型,没几年或者十几年就叫不响了,但是‘枫桥经验’这面旗帜,50多年来始终高高飘扬。”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我省“两个高水平”建设进程中,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更高,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注重。解决这些问题,回应人民需求,迫切需要我们准确把握新时代新要求,不断地丰富发展“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上的独特作用。  
**群众首创是“枫桥经验”的动力源泉,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王昌荣书记的一番话,令记者深以为然。记者接着问道:在新时代该如何总结提升推广“枫桥经验”?  
　　针对这一问题,王昌荣回答说,“枫桥经验”来自基层探索和群众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是“枫桥经验”茁壮成长、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这些年来,浙江省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体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互联网+社会治理”等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的经验做法,都是来自于基层的生动实践和干部群众的探索创造。实践证明,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过程,就是依靠群众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把中央和省委确定的工作目标任务与基层群众创造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深切体会到,基层的探索和群众的实践往往走在干部的认识前面。在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枫桥经验”,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浙江政法战线将继续走好群众路线,诚心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从群众中汲取丰富营养和智慧力量,始终把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作为最大优势,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把平安浙江建设和社会治理工作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  
**由点及面是“枫桥经验”的实践逻辑,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变“盆景”为“风景”、聚“风景”为“全景”**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王昌荣书记说起话来逻辑缜密且不失风趣。这一感受,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得到印证。  
　　王昌荣说,“枫桥经验”55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由点及面,不断辐射、扩大覆盖的过程。这些年来,“枫桥经验”已经在浙江大地遍地开花结果。  
　　在地域上,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走出诸暨、走出绍兴,在全省各地推广应用。在内涵上,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功能作用,已经由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拓展到防范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风险,延伸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在成效上,“枫桥经验”的推广应用,促进全省政法工作和平安建设整体水平实现了大提升,浙江不仅圆满完成了G20杭州峰会、党的十九大、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重大活动维稳安保任务,而且也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了明显增强。  
　　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对照中央和省委关于全面展示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的要求,仍然存在不少差距。比如,创新亮点做法复制推广不平衡、不充分,“盆景”多、“风景”少,有的甚至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今年3月29日,省委书记车俊在全省建设平安浙江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重要思想,沿着总书记开创的平安浙江建设路子砥砺前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奋力谱写新时代平安浙江建设新篇章。  
　　下一步,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切实拿出浙江应有的担当、应有的责任、应有的水平,以排头兵的姿态来做好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各项工作。  
　　具体来说,就是在全面总结新时代“枫桥经验”基础上,部署实施六大工程,即全科网格建设规范提升工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广工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规范提升工程,“互联网+”社会治理深化提升工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推广工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提升工程。通过深入实施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六大工程,努力变“盆景”为“风景”,聚“风景”为“全景”,形成遍地开花、满园春色的良好局面。  
**党建引领是“枫桥经验”的政治优势,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就要着眼固本强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王昌荣书记曾担任温州市委党校校长、浙江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对“党的领导”认识深刻,他说:  
　　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枫桥经验”的政治优势,也是其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实践表明,一个地方“枫桥经验”运用得好不好,基层治理得好不好,与基层党组织能不能很好地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密切相关。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要通过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根本在于通过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把党的领导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实现党领导社会治理、依靠群众加强社会治理。  
　　省委反复强调,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是政法战线一家的事,不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事,而是全省各级各部门的共同任务。要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教育功能、宣传功能、服务功能、管理功能,为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今年以来,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浙江各地各部门坚持党建引领,“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实。目前,总结提升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继续把“枫桥经验”这面旗帜举起来、扛下去,是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也是一项重大政治责任,作为浙江的干部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情怀、一种使命、一种担当,传承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续写好“枫桥经验”新时代篇章。　  
　　下一步,浙江政法战线将按照中央政法委和省委要求,进一步抓实做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总结提升推广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平安中国示范区建设,以实际行动迎接纪念大会的胜利召开。  
　　采访结束时,王昌荣书记与记者一行一一握手,说:“我刚才谈的,其实就是我对新时代‘枫桥经验’六个方面的深刻体会。”

　(本报记者　张亚　陈东升　崔立伟　王春刘子阳)

**跨越五十五载枫桥经验之树常青**

**□　本报编辑部**  
　　2018年的春天,东风送暖,春意融融。  
　　在这个春天,《法制日报》用17天,不间断地向读者讲述一个叫“枫桥经验”的故事。为了讲好这个故事,以法制日报总编辑为组长,集合了报社十余名精干记者,从枫桥经验的诞生地枫桥镇出发,踏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记录了每一次发现与感动,激发了一次次思考和感悟。  
　　前所未有的投入与专注,前所未有的用心与真诚,前所未有的思索与领悟,只因为“枫桥经验”这个题目值得我们去付出。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更是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基础毫无疑问是基层治理。  
　　基层不牢,地动山摇。我们忘不了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心念念之的事情就是基层治理,他与人大代表交流最多也是基层治理。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抓手在哪里呢?  
 **“枫桥经验”走来,带着泥土的芬芳**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唯有生活和实践才构成今人理论创新的根本性前提。——歌德  
　　回首新中国的历史,基层社会治理从来没有现成的理论可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枫桥经验”也是如此,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泥土的气息,反映着真实的生活,表达着现实的需要。  
　　1963年,被很多研究者认定为是“枫桥经验”诞生之年,所以“枫桥经验”诞生之始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当年的枫桥镇,也是当年全国要解决的一大“治理”难题。文斗还是武斗,是逮捕一批还是教育一批?这个现在看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在当年的枫桥镇却引发了一场思想大碰撞。  
　　枫桥镇的群众最终选择了以发动群众、教育说理的方式改造“四类分子”,这种选择无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这是当年枫桥镇干部群众的共识,而其中所蕴含的群众工作理念和后来总结提炼出的善治理念,也成为“枫桥经验”流传数十载依然长盛常青的内在基因。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年枫桥镇7个公社在整个运动期间没有出现打人的现象,更没有捕人的情况,这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实属罕见。  
　　1963年10月下旬,枫桥镇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要求好好总结枫桥的经验。11月上旬,在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共同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中,“枫桥经验”诞生了,其核心就是少捕人、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  
　　从历史的高度回顾“枫桥经验”的诞生,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枫桥经验”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找到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五十五年的岁月长河,曾经诞生过很多“理论”,也产生过很多“经验”,但大多都如昙花一现,很快就零落成尘,随风而去了。唯有“枫桥经验”如同一棵常青之树,历经岁月的考验,时间的磨砺,不但没有褪去光芒,反而更证明了它独特的社会治理价值和意义。  
 **“枫桥经验”成长,时间证明其伟大**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  
　　经过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枫桥经验”不但没有尘封,反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不断注入新的内容,焕发新的活力,绽放新的光彩。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是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题和时代背景,也是摆在全党和各级各地政法机关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这个时期,“枫桥经验”再次准确回答了时代之问。  
　　1985年11月,浙江省公安厅在诸暨县召开违法人员排查管理现场会,总结了枫桥区前五年把预防、打击犯罪同教育、挽救违法行为人员结合起来的经验。  
　　1991年1月,当时的国务委员王芳到诸暨考察“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提出要“充分依靠基层和广大群众维护社会治安,就是走中国式的公安工作道路”。  
　　1998年8月,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诸暨市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40多天,形成《预防化解矛盾,维护农村稳定——“枫桥经验”新发展》的调查报告,总结了枫桥地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四前”工作法,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要求达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2003年11月,纪念“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在诸暨召开,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  
　　2010年6月,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确定诸暨市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重点推进基层基础、公共服务、社会法治、民生福祉、社会环境五大建设。是年10月,“枫桥经验”被评为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特别贡献奖。  
　　2012年3月,习近平在听取参加全国人代会的浙江代表团汇报后指出,浙江推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模式、“大调解”工作体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做法,集中体现了服务群众的理念。在新的一年,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深化“平安浙江”建设,深入推进基层平安创建。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下,面对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枫桥经验”与时俱进,一方面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第一要务,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加快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切入点,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的原则,努力做到组织群众减少矛盾、依靠群众化解矛盾、服务群众预防矛盾。  
　　唯有时间能证明伟大。改革开放新时期赋予了“枫桥经验”新的内涵和新的时代特征,使“枫桥经验”成为我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不倒的旗帜。  
 **“枫桥经验”创新,勇立时代潮头**  
　　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所尊贵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康有为  
　　五十五年,新中国跨越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五十五年,岁月未减,“枫桥经验”颜色依旧。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又具有怎样的时代特征呢?这是《法制日报》记者这次走遍浙江想要找寻的答案。  
　　网格化管理:这是最贴近“枫桥经验”精神的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以网格员为核心,切实形成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层社会治理新形态；以网格员的工作为基点,真正实现了源头治理、化解矛盾、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的基层社会治理目标。当然,网格化管理并不是在简单还原上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它是党的群众路线与新时代新要求的完美结合。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这是依法治国背景下“枫桥经验”的新内涵。从桐乡的“三治”,到余村的绿水青山,再到衢江大调解、宁波化解医患纠纷,各地的“枫桥经验”新亮点无不包含着法治元素,体现着法治治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法治为矛盾纠纷处理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毫无疑问,注入了法治精神的“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与风采。  
　　基层社会治理数据化、智能化: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形式。从互联网之都——杭州,到来了就会记住“你”的桐乡,再到实现社会治理物联网的温州,新时代“枫桥经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你,得数据者得天下。在这个数据就是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时代,以“传统+科技”的手段,把大数据、云计算、智能管理广泛深入地运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无疑为“枫桥经验”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助力它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五十五年风流云散,五十五年沧海桑田,“枫桥经验”已经从当年的“斗争经验”,华丽转身为今天的融入了时代理念与时代元素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一支奇兵。  
 **“枫桥经验”发展,形在变而魂不变**  
　　世界万物,唯变不变。——《易经》  
　　回首“枫桥经验”五十五年的历史,我们看到,55年来,“枫桥经验”始终在变。这种变源自于其体现时代要求的创新精神,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枫桥经验”。无论是在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抑或是在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语境中,创新始终都是“枫桥经验”的活力之本、力量之源。  
　　55年来,“枫桥经验”始终不变。不变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善于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在灵魂。1963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枫桥经验”时说,“依靠人民群众是个好办法”。此后,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如何调整,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始终都是“枫桥经验”的灵魂。  
　　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内核,在变与不变的选择与判断中,“枫桥经验”创造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奇迹。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五十五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催生了“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结语**  
　　希腊神话中有一个人物叫安泰,他是大地之子,只要他始终脚踏实地,就会拥有无穷的力量。  
　　为什么五十五年的“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历久弥坚,经过近一个月的采访与报道,我们终于可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具备了这两个要素的“枫桥经验”,就像一棵深深植根于泥土中的大树,永远都郁郁葱葱,生机无限。  
 **编后**  
　　繁花四月,《法制日报》赴浙江采访组深入十余地市,探寻“枫桥经验”历经五十五载枝繁叶茂魅力所在、见证“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焕发出的蓬勃生机。  
　　一路行、一路问、一路听、一路思。原来,“枫桥经验”常青的秘诀就在眼前,它融入于群众笑容中、镶嵌于安定祥和间。  
　　这个秘诀便是:根植群众路线的沃土,紧扣时代跳动的脉搏。  
　　依靠群众、为了群众。55年间,“枫桥经验”将自己的根系深植群众路线的沃土,初心不改。  
　　从诸暨枫桥镇的“红枫义警”,到桐乡高桥镇的百姓参政团；从安吉余村的“两山”议事会,到台州的“蓝马甲”；从杭州上城区的“亲民尚和图”,到温州的“专职网格员”。种种新鲜事背后,都有一个老传统,那就是,依靠群众,群防群治,预防纠纷,化解矛盾。  
　　适应变化、创新载体。55年间,“枫桥经验”紧扣时代跳动的脉搏,积极运用科技创新手段,适应矛盾新变化、回应时代新需求。  
　　从互联网之都的网络纠纷调处,到桐庐的智慧治理中心；从鱼山的“连队+科技”,到台州的“四大平台”；从松阳的电子民情地图,到温州的“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种种社会治理“黑科技”背后,都有一个新趋势,那就是,用“互联网+”新思维解决网络时代新问题。  
　　新时代,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指引下,“枫桥经验”深植群众路线的根系将更加发达；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枫桥经验”创新的枝叶将更加茂盛。  
　　本报新时代“枫桥经验”新亮点系列报道到今天虽告一段落,但是,对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索还将继续。